李东明 陈小东 / 主编

43位越狱的后半生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蒋介石
- 军阀首领(1)
- 军阀首领(2)
- 军阀首领(3)
- 孤岛残梦(1)
- 孤岛残梦(2)
- 孤岛残梦(3)
- 孤岛残梦(4)
- 排除异己(1)
- 排除异己(2)
- 排除异己(3)
- 排除异己(4)
- 排除异己(5)
- 蒋介石的子孙后代(1)
- 蒋介石的子孙后代(2)
- 蒋介石的子孙后代(3)
- 李宗仁(1)
- 李宗仁(2)
- 李宗仁(3)
- 受人摆布的代总统(1)
- 受人摆布的代总统(2)
- 受人摆布的代总统(3)
- 受人摆布的代总统(4)
- 爱国思归的海外寓公(1)
- 爱国思归的海外寓公(2)
- 爱国思归的海外寓公(3)
- 备受礼遇的多情老人(1)
- 备受礼遇的多情老人(2)
- 备受礼遇的多情老人(3)
- 妻子们和儿子们(1)

- 妻子们和儿子们(2)
- 陈 诚
- 步步高升(1)
- 步步高升(2)
- 内战主将(1)
- 内战主将(2)
- 经营台岛(1)
- 经营台岛(2)
- 政坛腾挪
- 病逝台岛(1)
- 病逝台岛(2)
- 病逝台岛(3)

蒋介石

蒋介石（1887—1975）为中国国民党当政时期的党、政、军主要领导人，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从1920年代以后的几十年里，他的活动与中国现代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几乎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历史已经作出评判：作为一位常常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历史人物，蒋介石又是一位坚持“一个中国”立场的政治家。蒋介石去世后，遵其遗愿，“灵柩暂厝于慈湖，俟来日奉安于南京紫金山”。如今，孤零零的慈湖暂厝地，已成一是非争议之地。至于移葬大陆，中共方面已经明确表示：“悉听尊便。”

军阀首领(1)

蒋介石，幼名瑞元，谱名周泰，学名志清，后改名中正，字介石，1887年10月31日生于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一盐商家庭。蒋介石的父亲蒋肇聪共有六个子女，元配徐氏生下一女一男，分别取名瑞春、瑞生（即介卿）。第一继室孙氏没有生育。第二继室王氏生下二子二女，依次取名瑞元（即蒋介石）、瑞莲、瑞菊、瑞青。蒋介石与瑞春、瑞生虽然都是同父异母，但感情迥然不同，对瑞春长姐如母，十分尊敬，对瑞生则爱恨交加，常感厌恶。他对同母弟妹的感情都很融洽，尤其对早逝的瑞青怀念深切。

幼年的蒋介石十分争强好胜。在蒋介石和其他孩子玩耍时，尤其是面对年龄比他大、力气比他大的孩子时，他总是能够轻而易举地当上“大将军”、“督军”。蒋介石小的时候就是一个相当有主见的孩子。家人为了让秉性顽劣调皮的蒋介石有所束缚，在他5周岁的时候便请一位塾师在家进行启蒙教育；7周岁时，又被送进乡塾，开始读《大学》《中庸》《论语》《诗经》等书。在蒋介石8岁的时候，其父蒋肇聪因病暴卒。这对蒋介石幼小的心灵来说无疑是一个十分沉重的打击。但其母王采玉勤勉刻苦的品质使蒋介石的心灵受到深深的感动。他后来回忆说：“我是在孤儿寡母家庭中长大的，受到很多委屈，无可申诉。母亲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把我抚育成人，母亲的忍耐力是难以想象的，我也深受影响，我的个性就是在这种压迫环境中所形成。坚忍不拔的毅力，就是这样地锻炼出来的。”1901年夏，蒋介石曾参加县里组织的“童子试”，虽未能通过，但见了世面。以后他进入奉化县城的凤麓学堂，开始接受新式教育。1904年，蒋介石进入宁波箭金学堂读书时，校中的一位先生鼓励他读兵书和曾国藩的书。此后，蒋介石立志学习军事，并终生推崇曾国藩。

蒋介石的青年时代，即20世纪初年，正处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清王朝的政治统治极端腐败的时期。这时中国的

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正在蓬勃发展。许多爱国青年在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影响和带动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有的到国外去寻求中国革命的出路。蒋介石因家中受到当地官吏的欺压，对清政府产生反抗心理。他决心去日本学习军事。1905年，他到了日本。但是到了日本才知道，学军事必须清政府保送才行，只好进东京的清华学校学了半年日语，然后回国。之后，他考入新成立的保定通国陆军速成学堂，然后再在这所学校考上官派留日军校生，在日本“振武学校”（为中国留日军校学生预科学校）完成预科学业并作了一年的实习。上次在日本，他就认识了陈其美，这次，经陈其美介绍，他加入中国同盟会，觐见孙中山，直至涉足于辛亥革命队伍中来，与陈其美并肩作战，完成了从一个空有抱负、前途迷茫的青年向民主革命者的转化。在日本，他因在《军声》杂志上以“介石”为笔名发表文章，从此，蒋志清之名正式改为蒋介石。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蒋介石应陈其美之召，由日本束装返回上海，受命赴杭州参加了光复浙江之役。1912年初，由于革命党人内部派系之争，蒋介石奉陈其美之命，刺杀了光复军司令陶成章，随后去日本避风，并密切关注国内局势的发展。1912年冬，蒋介石从日本回国，他害怕刺杀陶成章的罪行被揭发，也不敢在上海政界中露面，如销声匿迹一般。直到全国上下一片讨袁之声，刺陶之事渐为淡化之际，蒋介石才又开始在陈其美的庇护下活跃起来。1913年，蒋介石参加二次革命。在攻打江南制造局时，他率众冲锋陷阵，直至子弹告罄仍不克，在转战闸北时又被英军缴了械。反袁失败后，蒋介石被迫东渡日本。1913年10月，蒋介石在上海参加了中华革命党。

1916年5月，陈其美被袁世凯派人刺杀后，蒋介石在政治上失去了靠山，心情十分悲伤，一度在上海过着花天酒地的放荡生活，流连于灯红酒绿之中。此后，蒋介石全心地投靠孙中山。1917年蒋介石奉孙中山之命，主持东南各省的党务和军事，他曾多次向孙面陈作战计划书。11月，他被任为大元帅府参军，1918年任援闽粤军总司令部作战

科主任，后改任粤军第二支队司令。蒋介石反复无常，常以辞职做晋级之术。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在广州叛变，孙中山急电在宁波的蒋介石：“事紧急盼速来！”蒋介石接到电报后，夜以继日地赶到广州，并潜入永丰舰，护卫孙中山直至脱险。事后，孙中山把蒋介石视为心腹，任他为东路军第二军参谋长。

军阀首领(2)

1923年孙中山确定联俄联共政策，筹备改组国民党。蒋介石被任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大本营参谋长。8月受孙中山委派，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军事、政治。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蒋介石被任为黄埔军校的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由于得到孙中山的信任和重用，蒋介石的仕途可谓一路飚升。1925年1月，陈炯明再次袭击广州。蒋介石指挥军校学生军和粤军进行了第一次东征，击败了陈部。6月回师平定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10月，蒋任东征军总指挥，举行第二次东征，攻占了号称“南中国第一险”的陈炯明老巢——惠州城。东征的胜利，使蒋的声望大增，被称为“广州革命根据地的缔造者”。1925年3月孙中山去世后，广东政府和统一战线的内部矛盾日益尖锐。8月，国民党的著名左派人物廖仲恺遭刺，蒋介石利用“廖案”，逼走了自己权力道路上的障碍胡汉民和许崇智。1926年1月，在国民党的二大上，蒋介石和汪精卫一样，以最多的票数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随后，蒋介石迫不及待地利用了“中山舰事件”，在国民党的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限制和打击在军队和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与国民党的左派，逼走了自己最大的政敌汪精卫。此后，蒋介石顺利地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组织部长。1926年6月5日，蒋介石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掌握了国民党的一切军政大权。7月9日，蒋在广州宣誓就职，随即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北伐之役。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参与，加上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帮助，在半年的时间里，歼灭了军阀吴佩孚、孙传芳部的主力，把革命的势力发展到长江流域。随着个人势力的增强和野心的膨胀，蒋介石的###本性日益暴露出来。这时，蒋介石急调嫡系部队到沪宁一带，在帝国主义和江浙财阀的支持下，加紧准备政变。1927年3月，他从南昌顺江东下至上海，沿途制造了一系列摧毁工农团体、摧毁国民党地方党部的流血事件。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

动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18日，在南京建立起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

1927年8月，因国民党内反对派的催逼，蒋介石被迫下野。9月去了日本，12月与宋美龄在上海结婚。1928年1月重新上台，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军委会主席。3月底，蒋介石率部进行了第二次北伐，以消灭奉、鲁军阀。经过两个月的激战，孙传芳被迫下野；张作霖率部出关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国民革命军占领北京，第二次北伐结束。年底，张学良在东北改旗易帜。至此，蒋介石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

此后，为消除异己，蒋介石策动了新军阀之间的混战。1929年3月囚禁李济深，挑起了蒋桂战争；5月通缉冯玉祥，挑起蒋冯战争。次年4月下令免去阎锡山的职务，爆发了中原大战。在蒋介石的阴谋策划下，各地军阀之间长期互相厮杀。军阀的混战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由于蒋介石的骨子里就###，此时，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苏区连续发动了五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前几次由于中共的正确领导，蒋介石均遭失败。第五次“围剿”，由于共产党内“左”倾错误指挥，致使蒋介石的阴谋得逞。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占领我国的沈阳。面对日军的侵略，蒋介石不主动组织抵抗，使东北的大片领土遭受日军铁蹄的蹂躏。此后，蒋介石冒天下之大不韪，仍坚持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残酷地摧残抗日民主进步力量。1936年12月，张学良和杨虎城因蒋介石拒不接受联共抗日的建议，迫于无奈发动兵谏，将蒋介石和他的军政要员扣押。在中国共产党的和平调处下，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返回南京。

从全面抗战爆发到1938年武汉失守的一年多里，蒋介石对抗战还是比较尽力的。八?一三抗战后，蒋介石于8月21日下令对上海日军发动总进攻。他曾多次和白崇禧、李宗仁等冒着日军炮火的危险，亲临前线督战。在蒋介石的指挥下，国民党军队进行了平津作战、淞沪会

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广大国民党爱国官兵不畏牺牲、英勇抗敌，大量消灭日本侵略军，迟滞了日军的战略进攻。但由于执行只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中国军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进入抗战的相持阶段后，蒋介石对抗日采取了消极的态度，把主要精力放在###上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代表中国政府正式对日宣战。1942年1月3日，蒋介石被推举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担负中国及泰国、越南地区联军部队的总指挥任务。不久，派出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此外，在国内也打过十多次的会战。1945年，中国人民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在国际盟军的有力支援下，终于取得了抗战的最终胜利。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依靠自己的经济军事优势以及美国的援助，企图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挑起新的内战。为了给自己有充足的时间来准备内战，蒋介石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签下了《双十协定》。但是，蒋介石错误地估计了当时的形势，对共产党的势力过于藐视。在他完成军事部署以后，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于1946年6月26日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挑起了一场新的内战。

军阀首领(3)

战争的第一年，蒋介石处于战略进攻阶段。解放区的军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奋起自卫，经过一年的奋勇激战，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同时，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此起彼伏，使蒋介石陷于全国人民的政治包围之中。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领解放军突破黄河天险，千里跃进大别山，转入外线作战。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使蒋介石处于被动的地位。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人民解放军顺利进展，迫使蒋介石由全面防御改为重点防御。正当蒋介石在制定“撤退东北确保华中”计划、举棋不定之时，人民解放军审时度势果断地发动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同蒋介石展开了空前规模的战略决战。蒋介石的主力被消灭殆尽。正因其发动反人民的内战，蒋介石成为中共明令通缉的首名战犯。1949年元旦，蒋介石为了获得喘息的机会，发表了“求和”声明，策划“划江而治”的阴谋。不久，蒋介石迫于形势下野。由于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天堑，4月23日解放南京，宣告了蒋家王朝在大陆的覆灭。12月10日黎明，蒋介石乘坐“美龄”号悄无声息地离开成都，飞往台湾。“黄鹤一去不复返”，自1927年算起，蒋介石统治中国长达二十二年。但就在他飞离成都的那一刻，蒋介石统治大陆的时代彻底结束。成都一别，蒋氏父子再也没能踏上大陆一步。

孤岛残梦(1)

蒋介石退居台湾后考虑的最主要问题，是怕共产党解放台湾。为了继续领导残兵败将与中共抗争，蒋介石早在华南和西南解放前，就打算“复职”，并迫使李宗仁引退。1949年10月10日蒋介石在台北发表《告全国###》，提出“###抗俄国策”，宣称“公理正义一定胜利”。鉴于这种情况，12月5日，李宗仁以“代总统”身份偕夫人郭德洁，并带上长子李幼邻、次子李志圣和随员李汉魂等人，自香港飞往美国“就医”，从此和蒋氏政权断绝了一切关系。

李宗仁走后，蒋介石便“完全实际上复职”。1949年12月24日，蒋知西南的顽抗已毫无希望，情绪极为低落。在受到巨大的挫折后，蒋介石开始反思过去并且研究国民党的改造问题。他在日记中写道：“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譬如今日生，过去一年间，党务、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已彻底失败而绝望矣。如余仍能持志养气，贯彻到底，则应彻悟新事业、新历史，皆从今日开始。”

蒋介石在台北选定草山士林的别墅作为住宅，并且在草山挂起了青天白日的“国旗”，但此时他的心境是十分凄楚的。他在63岁生日时写道：“本日为余63岁初度生日，过去之一年，实为平生所唯有的最黑暗、最悲惨之一年，惟自问一片虔诚，对上帝、对国家、对人民之热情赤诚，始终如一，有加无已，自信必能护卫上帝教令，完成其所赋予之使命耳。”

1950年元旦，蒋介石并没有在台北欢度新年。此时他与蒋经国隐居在台湾中部日月潭的涵碧楼，寄情于山水之间，兴叹“英雄末路的悲怀”，寄希望1950年“时来运转，否极泰来”！

谁知1950年对蒋介石来说，仍是愁云密布，就在元旦这天，中国共产党庄重宣布：“绝对不能容忍国民党反动派把台湾作为最后挣扎的根据地。中国人民解放军斗争的任务，就是解放全中国，直到解放台

湾、海南岛和属于中国的最后一寸土地为止。”蒋介石闻此心惊肉跳，长叹不已！

中共和中国人民的态度是蒋介石预料之中的，蒋家父子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和美国的关系上。在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从不肯把国民党军队的指挥权交给美国，为此他甚至与美国派给他的参谋长史迪威闹翻，最后硬逼着美国总统罗斯福把史迪威撤回国。可现在，蒋介石为了保住台湾，却一再声称愿意让出台湾国民党军队的指挥权。为了求得美国人的武力庇护，蒋介石已顾不得什么民族尊严了。元旦前夕，杜鲁门总统在白宫召开国家安全会议，就美国对台湾的态度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强烈主张派遣军事顾问驻台。代表美国鹰派的典型意见认为，台湾是艘不沉的航空母舰，是美国西太平洋的屏障，失去台湾，菲律宾、日本将受到威胁。国务卿艾奇逊却对此予以反驳，他说，即使美国介入，亦无济于事，美国的西太平洋防线，有没有台湾，无足轻重。杜鲁门总统作出最后的决定，支持了艾奇逊的见解。蒋介石对美国公开抛弃台湾的做法十分生气和恐慌，并竭力封锁这一消息。即使这样，还是有相当一部分国民党军政要员携带家眷和财产竞相逃往海外。

最使蒋介石伤感的是曾威震全国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这个统治中国二十多年的官僚买办集团，到了台湾只剩下蒋氏一家了。宋子文没有在大陆坚持到最后，中共把他列为重要的战犯，他便感到前途不妙，1949年1月24日辞去了在广州的职务，带着他的妻子到巴黎“治病”。号称中国头号大财阀的孔祥熙，更是“目光长远”，早从1948年起就和宋蔼龄在纽约的自家别墅中过起了流亡生活，继续在美国经营他的银行业，几乎和台湾无任何的“瓜葛”。

陈果夫、陈立夫兄弟，虽然和蒋介石一起逃到台湾，但这时的陈果夫因肺病严重已退出政界。其弟陈立夫虽精力旺盛，但为防止其再度操纵党权，影响到蒋经国的接班，蒋介石送他5万美元的路费，让他到美国的新泽西州养鸡去了。行前，陈立夫向宋美龄辞行，宋美龄送

给他一本《圣经》，并说：“你在政治上负有过这么大的责任，现在一下子冷落下来，会感到很难适应，这里有本《圣经》，带到美国去念念，你会在心灵上得到不少慰藉。”陈立夫的反应，颇出宋美龄的意料，他指着墙上挂的蒋介石的肖像，言语低沉地表示：“夫人，那活着的上帝都不信任我，我还希望得到耶稣的信任吗？”

孤岛残梦(2)

此后，蒋家父子竭尽所能“力挽狂澜”，喊出的口号也只是“保卫大台湾”。为了领导“###救国”之任，1950年3月1日，蒋介石正式宣布，他在台湾恢复“总统”职务。夫唱妇随，宋美龄迅速成立“中华妇女###抗俄联合会”。蒋经国辅佐父亲，军队、政工、特务一起抓，蒋纬国仍操留德所学的专业，任装甲旅长。真可谓全家总动员。为了维持蒋家小王朝偏安孤岛的局面，必须打肿脸充胖子，把“###”的高调一路唱下去。蒋介石提出的口号是：“要以台湾成为###的基地”，“一年准备，二年进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朝思暮想，念念不忘恢复对大陆的统治，夺回已经失去的权力。

但是，人们普遍认为，蒋介石开出的“五年光复大陆”计划，纯属个人的幻想。与蒋介石一起逃过来的人，对自己的前途都感到很渺茫，谈到出海作战，个个不寒而栗。因为人们对蒋介石的家底都很清楚：在经济上，要吃没吃，要穿没穿。败退前在大陆劫来的大量黄金美元，急时可做稳定金融之用，但经济上无根本的改善办法，早晚会“坐吃山空”。军事就更无法跟中共比了。江南先生写道：“陆续败退到台湾、海南、金门、舟山、大陈的国军，人数约有六十万之众，虚张声势有余，英雄拒敌不足。一个公开的秘密：败兵残卒，乌合之众，未经整补训练前，难挡强敌；很多单位，徒具虚名，官多于兵，或有官无兵，为普遍现象；官兵成分，五花八门，职业军人，混杂着受裹胁的农民；野战师团，零零星星，系临时由流亡学生、保安团队拼凑。由江西撤退到金门的十二兵团即是众例之一。这使我们联想到，刘备败走新野后的惨状。”故蒋介石空喊###，无非是给这股残兵败将打气壮胆罢了！

蒋介石本人其实也非常清楚自己的家底，他开始反思过去并且对国民党进行了一些改造。蒋介石在人事制度上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启用陈诚担任“行政院长”。陈诚的发迹，除了他是蒋介石的心腹外，

还有一点就是，他受到宋美龄的栽培。陈诚的妻子就是宋美龄的干女儿，并且他们的婚姻是蒋夫人亲自撮合的。陈诚主持台湾的内阁，他的台湾省主席一职由吴国桢来担任。蒋介石重用亲美派人物，其实就是向美国作出姿态。

1950年5月，海南、舟山诸岛相继解放，这使得蒋介石的心绪更加急躁。5月27日，《中央日报》发表社论说："台湾是进入战时了！"号召发扬"同舟共济"的精神。蒋介石为了防住最后的阵地，加紧在沿海修建碉堡防御工事，日以继夜，不眠不休。蒋经国主持的总政治部，发动各部队"纷纷歃血为盟，誓死效忠领袖"，甚至效法二战末期法西斯的"神风队"故伎，发动组织"###敢死队"。蒋介石在此前秘密访问菲律宾，与菲国首脑讨论建立流亡政府事宜。

1950年6月25日早晨7时，蒋介石像往常一样，穿着睡衣坐在起居室里，一边翻阅报纸，一边享用早餐。这时，负责情报工作的蒋经国急匆匆地从门外闯进来，抖动着手中的两份材料，冲着蒋介石激动地说："打起来了！打起来了！"蒋介石有些不满地略皱了一下眉头，拿起餐巾擦了擦嘴，问道："经国，什么事情儿这么慌张？"

蒋经国把手中的材料递给父亲，说："南、北朝鲜打起来了。"

朝鲜战争的爆发，无疑给处于死亡边缘的台湾国民党政权打了一针强心针，把它从病榻上挽救了回来。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称：鉴于共产党军队的占领台湾直接威胁到太平洋区域的安全，并威胁到在该区域履行合法而必要之活动的美国部队，因之，本人已命令美国第七舰队防止对台湾的任何攻击，并且本人已请求台湾当局停止对大陆的一切海空活动。两天后，第七舰队抵达台湾海峡，开始游弋。此外，美国的许多军政要员开始频繁地"光顾"台湾，使往日门庭冷落的台湾政权又开始逐渐热闹起来。

对朝鲜战争，蒋介石也曾想出兵南朝鲜，助美国一臂之力。但是，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以蒋介石的出兵有可能招来中共在朝鲜或台湾的干预为由，拒绝了蒋介石的请求。此后，蒋介石连续四次向美方提

出派遣第五十二军赴朝，均遭到美方的婉拒。尽管蒋介石出兵朝鲜的如意算盘没有实现，他所期盼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也未因朝鲜战争而爆发，但蒋介石在朝鲜战争中受益匪浅。从此以后，日暮途穷的蒋介石重新获得美国的保护，美台关系也从此由冷变热。随后，美国的军事物资源源不断地流入台湾。

孤岛残梦(3)

为了给部下打气，蒋介石每年都利用新年、青年节、双十节发表三次文告，总要重申“今年是###的决定年，明年是反攻胜利年”的滥调，却看不到任何的行动。其实，蒋介石的本意，仅限于利用这些岛屿“对大陆沿海渗透突击”，和“展开政治、心理、经济等攻势”。

自海南、舟山相继被解放军攻克后，大陈岛便成为台湾的屏障。为了加强该岛的防务，1950年6月，成立“大陈游击指挥所”，但内部番号众多，各自为政，并没有真正的统一指挥。直到1951年，“西北王”胡宗南化名秦东昌，派驻大陈，才开始纳入正轨。胡宗南到大陈，是处在明知不可为而为的情况下，自愿请缨，戴罪立功。蒋介石“准备配合国际局势间的演变”的美梦，自然也和他若干次的旧梦一样，为现实击得粉碎。胡宗南的命运也和他上司一样，穷途末路。

1954年5月6日，蒋介石乘“娥眉号”军舰亲自前往大陈岛视察，鼓舞士气。蒋介石刚离开大陈岛不久，解放军就一举占领鲠门、头门、田岙三岛。随后，解放军迅速在附近一江山岛的头门岛架设30余门远射程的巨炮，对蒋军造成严重的威胁。后来，解放军又出动米格15型战斗机10余架次，掩护轻重轰炸机13架次，向上下大陈岛港口设施与停泊炮艇，反复投弹轰炸。蒋军的空军因老式飞机的性能不如米格15，龟缩地面不敢迎战。与此同时，在渔山西南海面执行夜间巡航任务的太平舰，被解放军的鱼雷快艇击沉。太平舰被击沉，台湾的所谓海上优势的神话也破灭了。

蒋经国利用这次机会，指令“救国团”发起一项建舰复仇运动。他在第一次台北“救国团”的宣誓典礼会上说：“民国三十八年大陆的失败，大家只看到军队给人家打垮了，虽然这也是事实，但是要注意，除了军队，我们的青年也被中共解除了精神武装，青年组织也被瓦解。我们感到军队的整顿非常重要，这三年以来，我们集中全力在整顿军队上，但是我们领悟到民国三十八年失败的教训，更知道打倒中

共，复兴国家，还需要组织青年，团结青年，给他们一种新的教育，灌输他们新的精神。”然而，“新的教育”并没有拉住台湾的青年。后来向国民党政权挑战的，正是一群青年。

尽管美国和台湾因朝鲜战争而“眉来眼去”，但双方的矛盾依然存在。美国出于其全球安全战略考虑，加之杜鲁门政府从未打消对蒋介石政权的反感，所以一面对台伸出援助之手，一面又不允许蒋军###。按照杜鲁门的指示，游弋在台湾海峡的第七舰队除了负有“防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的使命外，还承担着使台湾“军事中立化”的任务。

由于有了美国武力的庇护，风雨摇曳的台湾局势初步稳定，国民党也有了安全感。于是，蒋介石把注意力转向内部，开展了筹划已久的旨在重建国民党的“改造运动”。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已再无其他地方可去。党内的“危机意识”和“救亡意识”极为强烈；大陆时期的原班人马已众叛亲离，不堪任用；退台后的人员其成分也十分复杂，忠逆难辨。为了收拢和控制已经溃散的国民党残部，确立和巩固在台湾的统治地位，也必须得整顿、改造国民党。

1950年３月，蒋介石在一次总理纪念周###上，对两千多名中高级干部发表了“严肃诚挚”的演讲，内容主要是：（1）虚心接受大陆失败的教训；（2）不惜牺牲感情与颜面，彻底改造国民党；（3）他自己将鞠躬尽瘁，争取最后的胜利。据说，当时会场上的气氛十分严肃凝重，在座的国民党干部中，不少人感动得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1950年６月美国的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蒋介石得到了喘息的机会，随即于７月22日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临时会议上公布了《关于实施本党改造之说明》《本党改造纲要》及《本党改造之措施及其程序》三个文件。

７月26日，蒋介石又在台北宾馆宣布由陈诚、张其昀、张道藩、谷正纲、郑彦芬、陈雪屏、胡建忠、袁守谦、崔书琴、谷凤翔、曾虚白、蒋经国、萧自成、沈昌焕、郭澄、连震东共16人组成“中央改造委

员会”。该委员会成立后，取代了原“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能，主持国民党的改造工作。这是改造运动的关键一步，执掌党权二十余年的陈果夫、陈立夫C.C.派被排除出中央，一批蒋系新人进入国民党中央领导核心。与此同时，另外聘请吴敬恒、居正、于右任、钮永建、丁唯汾、王宠惠、阎锡山、吴忠信、张群、吴铁城、何应钦、白崇禧、陈果夫、朱家骅、张厉生、王世杰、董显光、吴国桢等25人为“中央评议委员”，取代原“中央监察委员”，负责监督国民党的改造工作，使###派能够得到安抚。 8 月 5 日，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在台北正式成立。在蒋介石的主持下，16名“中央改造委员”宣誓就职，表示：要“遵从总裁领导”，“竭忠尽智”，完成改造任务；如果背誓，则“愿受党纪之严厉制裁”。随之，声势颇为浩大的改造运动在国民党的各级组织中同时展开。这项运动历时两年三个月，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孤岛残梦(4)

改造运动对蒋介石来说最大的功绩在于：通过改造运动，蒋介石借机把一大批的异己力量排除掉，代之以较为年轻的心腹嫡系，以蒋经国为核心的“太子系”势力乘机崛起。大陆时代曾风云一时的人物，如今面对改造运动无不黯然神伤、郁郁寡欢，只能生活在往昔荣耀的回忆之中。由于政治失势，心情不畅，他们中的许多人赴台湾后不到几年，便命归黄泉了。通过改造运动，国民党就纯粹成为蒋家的天下，真可谓“独此一家，别无分号”了。

此外，蒋介石在岛内开始一系列的经济改革及建设，为1960年代的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

1953年1月，美国共和党人、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任盟军最高统帅的艾森豪威尔五星上将，入主白宫。他改变了杜鲁门政府时期对台的政策。蒋介石军队对大陆的任何侵扰，美国都可以听之任之。随后，美国政府首次正式向台湾派出“大使”，并在台湾海峡举行了美台联合军事演习。

有了美国的进一步“撑腰”，蒋介石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就不敢进攻他占领的任何岛屿，但是中国共产党偏不信这个邪，在1955年1月18日，解放军奉命进攻一江山岛，激战53小时后全岛解放。国民党的守军司令王生明，顽固抵抗，结果作了蒋介石的牺牲品。

一江山岛的解放，使得台湾的全体将士几乎没有人再相信蒋介石能够打回大陆去。而且解放军的矛头，已经直接指向大陈岛。这下可吓坏了蒋介石。于是在美国“友人”的劝逼下，急派蒋经国到大陈岛，执行撤退该岛居民的“金刚计划”。消息一传出，岛上的居民立即骚乱起来。因为给出的理由十分吓人，说什么“最激烈的战斗即将到来”，这是保住性命的最后措施。撤退时，岛上居民痛哭流涕，他们不解：“为何要离开世代相守的家园赴台呢？”

一江山岛的惨败，大陈岛的放弃，使得台湾上下一片沮丧。大陈守军和居民撤离前，蒋经国自大昭舰带来一面“国旗”，举行升旗仪式。蒋经国强打精神勉励大家说：“不要难过，不要失望，此刻我们要下决心打回来。”然后，他闷闷不乐地领着军政官员走遍了大陈的街道，怆怀不已地来到海边。这次大陈岛的撤退，彻底谱写出“反攻复国无望论”的凄凉乐章，谁也不会再相信蒋介石发出的“我带你们回大陆”的梦话了！

排除异己(1)

岁月不饶人，蒋介石为了儿子的接班问题，可谓煞费苦心。到台后，蒋看到他的部下亲信在解放战争中纷纷投降中共，愈觉军政要员并不可信，传子之心更加迫切。为了便于长子继位，蒋介石对党政部门进行了改革。首先委任蒋经国为台湾省国民党党部主任。1949年8月20日，蒋在台北园山成立“政治行动委员会”，由唐纵任主任委员。到了1950年，改由蒋经国任此职。从此，蒋经国掌握了台湾最高特务机关。1950年3月，蒋经国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1964年2月，蒋经国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二级上将。次年升为一级上将。1967年“政治行动委员会”改为“国家安全会议”，仍由蒋经国主持。1972年，任“行政院长”，已控制了台湾的党、政、军、特大权。为了便于蒋经国培植自己的亲信，建立自己的军政干部体系，1950年9月，国民党在蒋介石的指示下，专门建立了一所军政干部学校。该校标榜信仰“伟大领袖蒋介石”和“青年导师蒋经国”，其真正的目的是为蒋经国时代做准备。

蒋介石在安排长子的同时，也把二陈的势力打击殆尽，为自己的长子腾出位子。1950年陈果夫已多病缠身，在政治上如同废人，陈立夫成为C.C.真正头头。蒋介石于是把陈立夫放逐到美国。蒋经国接手特务机构后对其进行了整编。中统解散后，军统被改成“国防部情报局”，主要是搜集大陆“中共的军事情报”。这时，蒋经国一手抓总政，一手抓台湾的特务总部，成了名副其实的大特务头子。为了使蒋经国能够顺利地“登基”，蒋介石搞的最大的动作是吴国桢和孙立人两案。1950年代前中期，美国想在台湾国民党各派中扶持一文、一武：文的是吴国桢，武的是孙立人。但这两人都没有好下场：一个被迫远走美国，一个被软禁多年。对此，美国纽约《中报》1988年4月17日发表声明说：“国民党退台之初，最具有国际声望的文武官员吴国桢、孙立人，在‘侯门深似海’的中国官场上，首先充当了蒋氏父子权力重新组

合的牺牲品。”而今，吴、孙均已经谢世，但台湾的官民对此仍愤愤不平。

蒋介石把吴国桢和孙立人两个具有广泛影响的强人打倒的同时，又把国民党内部曾经反对过他的人，统统打入冷宫，这样既可以使他们不致惹是生非，又可以使他们不再碍手碍脚。蒋介石把李宗仁陈立夫逼至美国后，接着又收拾了阎锡山、何应钦和白崇禧等人。

通过清除异己，蒋经国的地位步步高升，掌握了台湾的军政大权。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成为台湾最具有势力的政治强人。

坚持“一个中国”立场尽管与中共隔海对峙，但在事关中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蒋介石从未改变“一个中国”的坚定立场。他常常以一种特殊方式，与中共共同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美国人为防止台湾有可能被共产党收复，美国的西太平洋战略受到“威胁”，不断制造所谓“托管”台湾与“台湾地位未定”论。对此，蒋介石总会作出强烈反应。刚去职的前“外交部长”王世杰曾在台湾发表公开讲话，严厉批驳美国的论点。他说：台湾是“收复失地”，不是“军事占领区”，中国对该岛的内政外交有绝对主权；自1941年中国对日正式宣战以来，《马关条约》已经失效，自那时起，台湾在法律上就已归还中国，到战争结束时再从日军手中实际收回。他要求大家对“帝国主义实现直接或间接控制台湾的企图”提高警惕。

由于内战的原因，此时中国已经形成国共隔海对峙局面。但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国共两党的根本性共识。人民解放军正积极准备解放台湾，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国民党蒋介石撤退台湾，虽然立足未稳，也不停地叫嚣“###”。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地位未定”论受到海峡两岸不同方式的抵制和斗争。

当美国撇开在抗日战争中做出最重要牺牲的中国来搞所谓“对日和约”时，蒋介石于1951年6月18日发表声明，称台湾当局参加的权利不容置疑，不接受任何含歧视性条款。7月11日美英公布“对日和约”第二次方案，中国仍未被列入签字国，台湾当局即向美国提出严重抗议。9

月3日，即旧金山“对日和会”开幕的前一天，台湾当局“外交部长”叶公超再次发表声明，称旧金山“对日和会”所签订的条约对中国没有约束力。

排除异己(2)

1952年4月28日，迫于美国的压力，台湾当局接受了同日本“单独媾和”的方案，与日本政府在台北签订“和平条约”。同日，美国宣布“旧金山和约”生效。但蒋介石反对“台湾地位未定”的态度是坚定的，他始终没有放弃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对于“对日和约”与台日“单独媾和”，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多次发表声明，指出美国操纵的“旧金山对日和约”是非法的，没有道理的。同时指出美国策动日本、台湾缔结条约，意在构成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威胁，中国人民和政府坚决反对这个条约。

在“第一次台海危机”爆发前后，美国国内某些有影响力的人物就暗中策划在联合国搞“###”。杜勒斯在同台湾当局“外长”叶公超和驻美“大使”顾维钧会谈时，坚持说存在着“###”，正如同时存在两个德国、两个朝鲜和两个越南一样。他还面告蒋介石，美国把台湾同中国大陆之间的冲突看成是国际战争而不是内战。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军在一江山岛和大陈岛争夺战激烈进行之时，美国策划的“外岛停火”论出笼了。所谓“外岛”，是相对于国民党占领的台、澎以外的中国沿海岛屿的总称。美国的意图就是将沿海岛屿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并争取达成停火决议。这样，既不使美国卷入沿海岛屿的争端，又能将台湾问题国际化，形成“###”的局面。在取得英国的支持后，美国将一个被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称之为“神谕”的停火议案：《停止在中国大陆沿海某些岛屿地区敌对行动》，交由新西兰在安理会上提出。

台湾当局激烈反对将沿海岛屿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以及“停火”的建议。国民党认为，沿海岛屿争夺纯属中国内战，如交安理会讨论，可能会在联合国内出现“###”的前景，危及到台湾当局的“法统”地位。而所谓的“外岛停火”论，等于要国民党放弃“###”，为“###”的合法化铺设道路。这些都是台湾当局无法接受的。当美国代表就“神

谕”方案等问题与蒋介石会谈时，蒋介石坚决反对在联大讨论台海停火问题。叶公超也拜会艾森豪威尔，向他转达了蒋介石的三点意见，其中第一条就是希望美国防止“###”的理论和国际上的这一倾向。蒋介石还电示台驻美“大使”顾维钧：“对新西兰在安理会的行动应予以极大的保留，它将引起巨大的疑惑、忧虑和误解并鼓励和支持那些正在以‘###’为目标的人。”台湾当局代表蒋廷黻在联大发表演讲，反对讨论“停火”问题，并痛斥“###”的言论。此后，蒋介石在台北举行的“国父纪念日”大会上就国际形势发表长篇讲话，强烈谴责在外岛“停火”和“###”的设想，认为这是“荒谬绝伦”的，称大陆台澎均我土地，中国领土不容任何人割裂，斥责提出此主张的“民主国家”是“不守正义”、“不讲公理”、“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自私自利者”。蒋介石还多次向中外记者发表谈话，抨击联合国停火建议和“###”的主张，声称只有一个中国，国民党绝不放弃返回大陆的权利，联合国应当主持正义。

中国政府也发表声明，强烈反对对中国主权无理干涉的“神谕”方案。由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在国际舞台上首次公开一致地反对同一个针对中国的提案，这使美国无可奈何，于是新西兰提案未经审议就胎死腹中了。

事实上，在沿海岛屿问题上，美国和国民党当局从一开始就存在分歧。在国民党军队从大陈撤退期间，蒋介石多次发表广播演说和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声称大陈撤军是为了增强金、马防务，痛斥“停火”建议和“###”的谬论。他强调：大陆、台湾都是中国领土，中国不容割裂；曲解台湾的地位是别有用心的；“###”的主张“荒谬绝伦”。与此同时，台湾各政要也纷纷发表谈话，表明坚守金、马的决心。美国深感金、马是一个沉重包袱，为避免卷入中国的内战，必须让蒋介石主动放弃金门、马祖，彻底切断台湾与大陆之间的联系。“金马撤军”论甚嚣尘上。对此，蒋介石在1955年2、3月间多次会见英美记者，严厉批驳了“金马撤军”及“###”的谬论。他强调：不论是否获得美国的

援助，都将全力防卫金门、马祖，一切在所不顾。他还说，如果现在再从金门马祖撤退，那么就连小孩子也不相信在防守台湾时他能得到美国的支持；如果他放弃金门马祖，只能导致产生进一步的压力，走向台湾被托管。为了表示坚守金、马的决心，蒋介石偕宋美龄，登上金门岛进行视察。此后，他不顾美国阻止，坚持往金门增兵。到1958年夏，已有1/3的国民党陆军被部署在这一地区，表现了蒋介石“防守”沿海岛屿的决心。

排除异己(3)

“第二次台海危机”时，美国再次逼迫蒋介石撤退金、马，蒋介石在高雄对美联社记者发表了针锋相对的谈话，表示坚决反对减少外岛驻军，反对使沿海岛屿的地位有任何改变的做法，声称台湾没有接受“停火”的义务。

在美蒋矛盾冲突中，中国政府清楚地意识到美国逼蒋放弃金马的意图。从10月3日到13日，毛泽东连续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台湾海峡局势。会议决定，为反对美国分离台湾的阴谋，将金、马留在台湾当局手中，更符合双方“一个中国”的共同利益。毛泽东还通过“中间人”给蒋介石传话，对蒋介石抵制美国分离台湾的行动予以高度肯定。毛泽东指出，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同他合作；我们赞成蒋保住金门、马祖的方针。

1959年初，美国炮制的一个完整的“###”方案出笼。这个方案与以前美国政府的论调的不同在于，明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再以“中华民国”代替中国，而准备让台湾永远“独立”出去。同时，也要蒋介石放弃“###”的想法。甚至肯尼迪与尼克松竞选总统的辩论也拿中国台湾“开涮”，利用中国沿海岛屿问题，互相攻击对方。

蒋介石坚决拒绝美国方案，并密切关注有关台湾地位与命运的美国人之间的“辩论”。他对美国记者考普莱发表谈话，不点名地批评了肯尼迪的观点，坚决地宣称，台湾即使战斗到最后一人，也不放弃沿海岛屿，哪怕美国不予支持也决不改变这一立场。台湾当局“外交部”还发表声明，点名批评了肯尼迪。在美国制造的“###”问题上，蒋介石的态度一向很明确，即坚决反对所谓的“###”。由于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坚持了“一个中国”的坚定立场，从而使得1960年代美国历届政府所推动的在联合国实现“###”的方案始终未能得逞。蒋介石在维护祖国统一问题上，表现出坚定的立场，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蒋氏父子还重拳出击，坚决地反击了“###”逆流。

“###”是美国、日本反华势力策动、支持的产物，它的产生具有复杂的历史、社会和政治的原因，它是一股历史的逆流。蒋氏父子执政期间，国民党对任何“###”的言行，采取严厉的打击镇压政策，其武器就是将之绳之以法。台湾当局依据“刑法”和“惩治叛乱条例”，以“叛乱罪嫌”或“涉嫌###”、“破坏国体，窃据国土”以及“颠覆政府”等罪名给“###”治罪，并以军事法庭审判“###”案件。典型案例是廖文毅“###案”、1960年代最具影响的彭明敏“###”案、1970年代的“###联盟”案、基督长老教会案等。这对“###”分子是有力的震慑。

对于逃亡海外的“###”分子，台湾当局一律“列注名单”，下达通缉令，并严厉禁止“###”分子入境返台。“###联盟”的大小头目、先后流窜海外的“###”分子200多人均上了“黑名单”。这些人是台湾有关部门重点掌控和“关注”的对象。

在台湾当局的严厉打击下，“###联盟”及其一批流亡的“###”分子，在海内外可谓臭名昭著。一般海外华人、台籍同胞，对之嗤之以鼻，其组织始终发展不起来。在美国的“###”分子也只能靠蛊惑和欺骗行事，或龟缩一隅，干些恐怖、暗杀等黑社会的勾当。

从1940年代中期以后到1980年代末，在蒋氏父子治理台湾的四十多年里，对任何“###”的言行都予以坚决打击，使一小撮“###”败类在岛内无立锥之地，在海外亦处于穷途末路之境。蒋氏父子反“###”的立场和行动，坚持了一个中国的立场，维护了中华民族的统一。

此外，海峡两岸的中国人为维护南沙群岛和钓鱼岛主权，进行了共同的斗争。蒋氏父子在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问题上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油尽灯枯蒋介石到台湾后依然过着大陆时期刻板而有规律的生活。据曾当过蒋贴身侍卫的翁元披露，蒋介石一天的工作、生活安排大致是这样的：每天早晨6点起床（冬天7点左右）。起床之后，为了不吵醒喜欢晚睡的宋美龄，蒋介石不打开灯，在黑暗中摸出一支钢笔手电，蹑手蹑脚地到盥洗室进行洗漱。当蒋介石轻轻带动门把的那一

瞬间，在外值班的警卫就知道蒋已经起床，于是按下电铃，告诉当班的贴身副官前来服侍蒋介石。

排除异己(4)

洗漱完毕后，蒋介石在阳台上做自编的一套体操，然后唱圣诗。奇怪的是，蒋介石一唱到“天父”或是“圣哉、圣哉”的时候，他都要面朝东方行脱帽礼。唱完圣诗后，蒋介石就回到书房静坐祈祷。静坐祈祷前，先是用毛毯把自己的膝盖盖好，接着给自己上眼药水，他的眼药水是特制的，主要起保健作用。点完眼药水后，蒋介石就开始静坐。每次静坐的时间差不多都是40分钟。

做完静坐和祷告后，蒋介石就到他的书房里做“早课”，也就是写日记和读报。与常人不同，蒋的日记不是当天晚上写，而是隔天早上写，这样做一是蒋不习惯熬夜，二是早晨头脑清醒，便于回忆，三是利于对前一天的事进行检讨和反省。他喜欢看的报纸主要是台湾出版的《中央日报》《中国时报》和《联合报》。如有喜欢的内容，他就叫他的秘书在吃早餐的时候读给他听。

看过当天的报纸后，蒋就吩咐副官和侍卫为他准备早餐。副官推着一辆可折叠的餐桌，放到蒋介石所坐的沙发前，他就坐在沙发上进餐。蒋介石是非常重视饮食的，他吃的食品非常的精致，而且是中西结合。蒋介石的厨师是不好当的。既要天天变换花样，又要照顾他的牙口，还要兼顾风味和营养，让他吃得舒服称心。蒋介石特别喜欢喝鸡汤，所以厨师每天都要为他准备一只老母鸡。不管是中餐还是晚餐，至少要有五道菜，菜肴通常是二荤三素或三荤二素。除此之外，蒋介石还特别喜欢家乡浙江的一些小菜。

吃完早餐后，蒋介石就动身到“总统府”去办公。他每次出行要动用大批的军警为其“保驾”，风光依旧。蒋介石每次外出，经常有同一类型的小汽车四五辆组成的车队同行，以防不测。车队经过的各道口所有的红绿灯装置，一律开绿灯。但在中山路北段，有一处通往基隆、宜兰、苏澳的铁路公路平交道，每天火车来往频繁，在经过这段平交道时，必须停车等候，对蒋介石的安全构成威胁。于是有善于拍

马屁者向台湾省主席严家淦建议，希望在这一地段建一座公路天桥。严家淦深谙为官之道，立即下令建桥。桥建好后，许多市民想在桥下做点小买卖，但有人认为这对蒋介石的安全会构成威胁。严家淦认为，既然建桥的最初目的就是为了考虑“总统”的安全，于是下令不许在桥下设摊营业。蒋介石对严家淦此举很高兴，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严主席深谋远虑，殊堪嘉奖。”蒋介石一般是每天上午10点钟左右开始到“总统府”办公。他上班的内容不外乎是接见外宾或者召见部属讨论公事。下了班，他就直接回官邸吃午饭，然后再睡个午觉。午觉睡好后，他就习惯性地在院子里散散步，下午就在自己的家中办公。其实也就是看看报纸，剪贴一些自己喜欢的报道，顶多再处理几件比较紧要的公文。到了下午4点钟左右，如果宋美龄愿意的话，蒋介石就和她一起到台北的近郊去兜兜风，然后再回来吃晚饭。

蒋介石到台湾后的夜生活十分的单调，一般都是在家里看看电影。其实这多少也是受到宋美龄的影响。宋美龄喜欢看各式各样最新版的中外电影，并且经常被影片中的故事情节吸引得废寝忘食。蒋介石则不然，到了睡觉的时间，他一定会叫暂停，等第二天接着看。

晚上睡觉之前，蒋介石会习惯地静坐祈祷40分钟左右，再散步片刻，然后才回房间睡觉。

1972年3月，蒋介石做了前列腺手术，后转为慢性的前列腺炎，健康状况从此一蹶不振。

就在这一年5月，第五届“国大”召开，蒋介石第四次“当选”连任“总统”。20日，蒋介石到阳台上接受20万民众的欢呼。台湾电视公司担任实况转播，该公司副控室在“总统”接受欢呼的画面转到“副总统”的特写时，屏幕下端居然出现电视连续剧的对白字幕：“大哥，不好了……”对于这样一个大喜日子来说，真是大煞风景。事后，台湾当局即派人调查。

阳明山一次意外车祸，对蒋介石的身体造成极大的伤害，此后更是疾病缠身。蒋介石自己有一次也十分苦恼地对前来探望他的一位老

部下说：“自从这次阳明山车祸之后，我的身体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不但腿不行了，身体也不行了。”时隔不久，蒋介石又因便秘导致肛门肌肉侵蚀，经旷日持久的治疗，吃尽了苦头。1974年12月，也就是小蒋任“行政院长”的第二个月，蒋介石因感冒引起肺炎，随即住进荣民总医院。次年1月，发生心肌缺氧症，经紧急抢救转危为安。后腹部不适，心脏功能欠佳，血液循环不畅，又陷入危机。“4月5日下午8时1刻，病情进一步的恶化。医生发现老人脉搏突然转慢，当即实行心脏按摩及人工呼吸，并注射药物等急救，一二分钟后，心脏跳动及呼吸即恢复正常。但四五分钟后，心脏又停止跳动。于是再实行心脏按摩、人工呼吸及药物急救，然而此次效果不佳，心脏虽尚时跳时停，呼吸终未恢复，需赖电击以终止不正常心律，脉搏、血压已不能测出。至11时30分许，蒋公?目瞳孔已行放大，急救工作仍继续实行……但回天无术。”

排除异己(5)

1975年4月5日11时50分，蒋介石寿终正寝，终年88岁，台湾按传统计岁法宣布为89岁。4月6日，长子蒋经国亲自撰悼词，以示哀念：“天上的主啊，请垂听我的呼声！

“我父亲蒙你的恩召，这是他老人家伟大一生的最高潮，这是光荣的胜利，因为他已经冲破魔鬼对他的一切困挠、压迫、刺激和侮辱，我们感情上的损失固大，但我们不能为了自己的悲哀而影响了他老人家的光荣。”

蒋介石之死，使蒋氏全族和许多国民党官员十分悲恸。这天晚上，台北上空雷电交加，倾盆大雨，蒋经国称为风云异色，天地同哀。很多党政要员联想认为，美国可以放弃阮文绍和他的越南土地，同样地，一个没有蒋介石的台湾，前途将极为暗淡。

蒋介石病逝后，台湾当局开动一切宣传机器以表示对蒋介石死亡的“隆重哀悼”，并规定4月6日起，历时一月为“国丧”期，停止一切娱乐。4月9日，蒋的灵柩移入国父纪念馆，供民众瞻谒遗容。

就在4月9日这天下午，经过蒋经国的允许，张学良携赵四小姐前来吊唁。张学良站在水晶棺旁，久久凝视着双眼紧闭的蒋介石。在呼风唤雨、叱咤风雨六十年后，这位中国历史上一代强人终于永久地泯灭了。张学良难免要想到自己同这位逝者之间的恩怨。在自己的一生中，他居然近五十年的时间是受着蒋介石的支配！先是支配他的政治生涯，接着支配他的个人命运，支配他的自由生死。他的生命因蒋介石的存在而完全改变了自己的轨迹！他抬起头来，看看自己写给蒋介石的挽联：

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

为了这副挽联，张学良足足想了3天。这16个字又岂能道白他与蒋介石之间的恩恩怨怨。

4月16日是蒋介石的入殓日，由严家淦“恭读祭文”。此时蒋介石身穿长袍马褂，覆盖青天白日旗，随其遗体入殓者，有蒋介石所获得的三枚最高勋章：“采玉勋章”、“青天白日勋章”、“国光勋章”，以及四本经常阅读的书：《三民主义》《唐诗三百首》《圣经》《荒漠甘泉》。台湾当局为了祭蒋“升天堂”，还施行了基督教仪式。仪式后，将其灵柩由国父纪念馆移到台北之南，60公里外的桃园县慈湖。沿途，当局发动了成千上万的学生在灵柩所经过途中跪地“迎灵”；商店停止营业，建筑物的颜色一律改涂成素色；交通路口均搭牌楼，各家要挂挽额，失修的马路一律要整修。此外，还要求民众在大典鸣炮的时候，在原地默哀3分钟，可谓“隆重至极”。

蒋介石的遗体在做了防腐处理后，一直停放在慈湖“行宫”，供人们前来参观。台湾当局为了永远纪念蒋介石，并把他奉为###的精神领袖，又于1976年10月耗费巨资修建了一座“中正纪念堂”。“中正纪念堂”内矗立着一尊重约21.25公吨的蒋介石坐姿铜像，在正厅两侧的大理石壁上刻着两句蒋介石的话：“生活的目的在增进人类全体之生活”、“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继起之生命”。纪念堂下层还陈列着蒋介石的遗物、文献和喜欢读的书籍。台湾当局还在其他地区建造了一些纪念馆或铸刻了一些铜、石像之类。

蒋介石在孤独、凄凉、失望的绝境中，带着遗恨过世了，遗蜕浮厝海岛之上。正如他生前所说的那样：“唯有主的同在可以消灭孤独和忧愁。”这可以说是他晚年心境的写照。

1975年4月6日，国民党中常委召开会议，决定由“副总统”严家淦继任“总统”。4月28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开会，修改党章，保留总裁名义，设主席，并推荐蒋经国为主席。从此，蒋经国就成了台湾名副其实的第一把手。

蒋介石的子孙后代(1)

蒋介石一生与四个女人正式生活过。1901年，他14岁，遵母命与大他四岁的毛福梅结婚。毛氏曾为陪他读书，进县城的新式女子学校读过一年多。她是蒋经国的生母。1913年，蒋介石收姚冶诚为侧室，1921年再纳陈洁如。但这两个人都未能与蒋长期同居。1927年12月，蒋介石登报声明与毛氏离婚，与宋美龄结婚。一般人所传这是一次政治联姻，其实两人的婚姻非常美满，甚至可以说最终成就了蒋介石的一生。宋美龄曾有过一次小产。

就蒋氏家族而言，成功立业并光宗耀祖者是蒋介石，可谓蒋家第一代。第二代是蒋经国、蒋纬国两兄弟。第三代系指蒋氏兄弟所生的子女。蒋经国与蒋方良夫妇有三子一女，即长子蒋孝文，长女蒋孝章，次子蒋孝武，三子蒋孝勇。此外还有蒋经国与章亚若生下的一对孪生兄弟章孝严和章孝慈。蒋纬国为蒋介石的养子，但蒋家待如亲生。蒋纬国膝下只有一个儿子蒋孝刚。蒋家第三代成家立业后，各自走着自己所选择的人生道路。

蒋孝文于1935年12月4日出生在苏联，由于生长在“天下第一家”，自幼受到太多人的奉承、纵容和拍马屁，从而养成许多不良习气，吃喝嫖赌，无所不能。由于生活极度糜烂，导致意识力的丧失，肢体也处于瘫痪状态。虽经多次抢救肢体得以恢复，但神经错乱，俨然成为一个废人。在蒋经国去世一年多后，蒋孝文病逝于台北。蒋孝文和妻子徐乃锦于1961年生下女儿蒋友梅。徐乃锦对女儿要求一向很严，经常告诫她要忘掉自己特殊的家庭背景，养成独立自主的意识和生活能力。蒋友梅求知欲、事业心、责任心都很强，是蒋家第四代的佼佼者。她在英国剑桥大学拿到国际商贸理论的学位后，到渣打银行任职。尔后再次回到剑桥，攻读艺术学，成为一名画家。1996年，她与英国人逸恩结婚，1998年有了他们的女儿。逸恩虽出身贵族家庭，但从事保险业且事业有成。

蒋孝章于1936年生于苏联，第二年便回到中国。她从小聪敏伶俐，深得蒋介石夫妇的喜爱。蒋孝章在留美国期间，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与大她十多岁的台湾前“国防部长”俞大维之子俞扬和于1961年结婚，并于次年生下独生子俞祖声。俞扬和从空军退伍后一直经商，远离政治，与蒋经国的关系比较冷淡，也很少回台湾探亲。

蒋孝武于1945年生于奉化老家。他毕业于德国慕尼黑政治学院，并在读书期间与一位瑞士华裔女子汪长诗结婚。回国后，主要从事文化事业，并且在文化界崭露头角。从1976年后，他开始涉足情报工作，并担任“国家安全会议”执行秘书。蒋孝武的政治行情曾一度看好，但因“江南事件”影响，特别是其父死后，国民党政权的“本土化”、“非蒋化”的影响，蒋孝武的政治前途遭到彻底的封杀。在外放新加坡、日本返台后即病逝，年仅46岁。蒋孝武与汪长诗生有一对儿女，即蒋友兰和蒋友松。后来两人性格不合离婚，蒋孝武再娶了蔡惠媚。蔡为照顾丈夫的孩子，没有再生育。蒋友兰和蒋友松均毕业于美国加州伯克莱大学国际经济系。蒋友松在旧金山创办一家投资公司并成功上市，蒋友兰也在香港经商并有所发展。

蒋孝勇生于蒋家王朝在大陆崩溃的前夜，即1948年10月27日。次年，迁居到台湾。中学毕业后进入陆军军官学校学习，蒋介石对这个孙子期望很高，指望他能成为一名军人，能够担当“光复国土”的重任。可惜的是，蒋孝勇在学习期间不慎足踝受重伤。随后，他转到台湾大学政治系学习，毕业后经营实业。蒋经国死后，蒋孝勇举家迁离台湾，远避加拿大，后来又移居美国。1996年初，蒋孝勇查出已到癌症晚期。为了寻找中医治疗方法，他在家人陪同下于7月下旬来到北京，得到有关医疗机构的认真检查与医治。他还回到奉化老家访问，祭奠先人。12月底，蒋孝勇去世。他与夫人方智怡有三子，其中第三子蒋友青生于移居加拿大后。两个大孩子蒋友柏、蒋友常在台湾与加拿大读完中学，后入美国纽约大学学习信息管理。以后，他们运用自己所学，在旧金山电脑市场上打拼，将业务发展到欧洲。

蒋介石的子孙后代(2)

在蒋家第三代中，章孝严和章孝慈经历最为曲折、坎坷并且又是最“争气”的，所以为台湾各界人士普遍看好。

章孝严大学毕业后，参加“外交官”考试，成绩优秀，从此，走上了职业外交官的生涯。曾先后担任驻美“大使馆”秘书，北美司科长、司长等职务，1986年被提升为“外交部次长”，一度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国民党秘书长。1992年转任国民党中央侨务委员会委员长，是国民党十三届、十四届中央委员。2005年2月，章孝严悄悄完成了身份证改姓程序，自3月2日起，正式更名为“蒋孝严”。近年来，已过花甲之年的蒋孝严经常往返于海峡两岸，为“三通”与两岸交流做了不少具体工作。他与夫人黄美伦生有惠兰、惠芸二女与万安一子。长女惠兰在大学社会学专业毕业后，到美国波士顿大学从事电影制片研究。拿到学位后返回台湾，进入电影界。她导演的处女作《小百无禁忌》在2000年法国戛纳电影节上得到国际影评人奖入围资格、“金摄影奖”的前三名。第二年，该片又获邀出席爱丁堡国际电影展。

弟弟章孝慈对政治不太感兴趣，醉心于治学，全心从事法学研究。从海外回国后，长期在东吴大学执教，研究成果累累，先后担任过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教务长、副校长、校长，也是国民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1993年8月，章孝慈作为蒋氏家庭的成员，首次进入大陆。生前，他曾多次回大陆进行学术交流。由于生活在学术圈中，一生清贫，晚年重病后竟无力支付医疗费用，靠社会捐助走完他的最后人生。他与夫人赵申德有子女二人，章劲松与章友菊均继承父志，以法律为专业。

蒋经国逝世后，蒋纬国在蒋氏家族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并且被认为是一位对社会各阶层最具“亲和力”的人。可惜的是，在党内权力角逐中，他被李登辉所打败。蒋纬国晚年多病，但他对海峡两岸的政治非常关心。他反对“###”，希望祖国早日统一。

蒋纬国的结发妻子石静宜去世后，又与邱爱伦结婚，并于1962年生下了独生子蒋孝刚。蒋孝刚从小就养成了独立自主的性格。在英国剑桥大学攻读法律学位期间，他与侄女蒋友梅一样，从不暴露自己的身份，潜心学习，是公认的高才生。毕业后，前往美国，通过律师资格考试拿到了律师执照，在纽约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蒋孝刚与王倚惠结婚后，育有一子一女蒋友捷、蒋友涓。

蒋家后代有许多晚辈是先于宋美龄去世的。第二代蒋经国、蒋纬国，第三代蒋孝文、蒋孝武、蒋孝勇、章孝慈都已作古，人丁凋零，不胜凄凉。

蒋经国曾希望通过“梅兰菊”、“松柏常青”的涵义，绵延蒋家第四代的命脉。第四代长男蒋友松2002年在美国同徐子菱结婚时，当时尚在人世的宋美龄发去了贺电。徐子菱在三藩市生下一个女儿，取名Josephine。蒋友柏也于2002年和台湾影星林??怡结婚，次年生了一个女儿，取名为蒋得曦。

蒋家第四代子孙目前大多从商或学习艺术，在文化、艺术界发展，几无人涉足政治，除了蒋孝严、章孝慈子女留在台湾工作学习之外，其他的子孙大都散居海外。仅蒋孝严今天依然活跃在台湾政坛。

如今，由于最高统治权的转移，蒋家的门庭已经冷落，蒋介石的子孙后代经过痛苦的沉思，已经走出了心理的阴影，努力地寻觅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

参考文献：方庆秋、张宪文：《蒋介石全传》，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肖黎、马宝珠、吕延涛：《影响中国历史的一百个男人》，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解力父、冯光：《蒋氏家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张同新、何仲山：《从南京到台北》，武汉出版社2003年版。

文思：《我所知道的蒋介石》，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

何虎生：《蒋介石宋美龄在台湾的日子》，华文出版社2003年版。

蒋介石的子孙后代(3)

陈红民、赵兴胜、韩文宁：《台湾风雨（蒋家王朝之二）》，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

谭一青：《蒋介石与美国》，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

窦应泰：《蒋氏家庭第四代》，华文出版社2003年版。

（执笔：操龙德）

李宗仁(1)

李宗仁(1891—1969)从考入广西陆军小学起，就开始了一生的军事生涯。他从排长干起，拉出一支人马，树起新桂系这一山头，最后做到中华民国代总统，表现了他特殊的能力。在北伐与抗战中，李氏叱咤风云，青史留名。大陆解放后，他不愿去台湾，前往美国，隐居长达十几年。晚年，受“爱国不分先后”政策的感召，他冲破重重阻碍，冒着生命危险，于1965年7月间偕夫人郭德洁毅然回到祖国大陆，再次成为轰动世界的新闻人物。

从排长到新桂系领袖李宗仁出生于广西临桂县两江圩乡一世代耕读为业的农家，1908年冬考入陆军小学。在校期间，他对军体训练刻苦认真，锻炼又勤，加上身体健壮，又自小学过几手拳脚，术科各项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尤以器械体操为出色，每逢课余，他到场上训练，就像作精彩表演。凡有李宗仁在操场上练习，不仅同班同学，下届学生，甚至上两届学兄也到场上观看，指点评价，高声赞扬。劈刺更是他的拿手项目，许多比他年纪大身材高的同学都不是他的对手。他技术纯熟，动手敏捷勇猛，那些人与他一交手，就只好取守势。这样，李宗仁在同学中就有了“李猛仔”的雅号。辛亥革命爆发，广西也宣布附义。不久，陆小改为陆军速成学堂，李宗仁又接受了近两年的军事教育。1913年秋，他以优异成绩毕业，被选拔到南宁广西将校讲习所，先后任准尉见习官、少尉队附，再晋升中尉。讲习所停办后，李宗仁应聘到桂林市省立模范小学任高级班军训教官。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西南军政各界群起兴师讨袁。李宗仁经同学介绍，投入林虎为总司令的护国军第六军，当了一名中尉排长，参加了讨袁的护国战争。袁世凯死后，随林虎部转而###粤督龙济光，战斗中，李宗仁亲举连旗，带伤冲锋，很快晋升连长。1917年秋，他所在营北上入湘，参加护法战争。李宗仁因在战斗中表现出色，得一“李铁牛”的诨名。战后，年仅25岁的李宗仁升任营长。1920年8月，参加第一次粤桂

战争，以勇敢善战闻名两粤。翌年，粤桂战争重起，他先后升任帮统、统领，然后抓住时机，将自己的队伍拉进六万大山，避免与粤军的冲突。随后他接受陈炯明收编，任“粤桂边防军第三路”司令。

粤桂战争结束后，李宗仁率部驻扎玉林五属。这时，广西全省骚乱，八桂无主，各自称霸。他在五县绅商支持下，将“粤桂边防军第三路”改称为“广西自治军第二路”，通电就任该路军总司令。不久，黄绍?f率领所部千余人加入该军，使李宗仁的实力大增。他操持所辖七县的军政大权，一面整军经武，一面修明地方吏治，为削平群雄，统一广西打下了基础。

从1924年初到1925年秋，李宗仁和黄绍?f、白崇禧合作，消灭陆荣廷、沈鸿英等旧桂系势力，击退唐继尧东侵之师，统一了广西。“新桂系”从此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活跃的力量。

在李宗仁统一广西的同时，广东经过二次东征也初告统一。1926年初，双方通过会晤，两广正式统一于国民政府号令之下。1月，国民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李宗仁被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3月间，广西两个军合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李宗仁任军长。

7月，北伐战争的序幕揭开。李宗仁率领第七军2万余人，分成第一、二路军，次第入湘，###吴佩孚。第七军始终战斗在最前线、最激烈的战场上，成为北伐军的一支劲旅，有“钢军”之称，与“铁军”第四军齐名。在北伐战斗中，李宗仁为右纵队指挥官，率领四、七两军沿武长路齐头猛进，强渡汨罗河，夜袭汀泗桥，直逼贺胜桥，将吴佩孚彻底击败。然后李宗仁又率第七军入赣继续###孙传芳，在赣北孤军奋战，出奇制胜，击溃孙部主力，与友军一起克复九江、南昌。正是在北伐期间，蒋介石主动提出与李宗仁互换兰谱，结为异姓兄弟，这一时期蒋李合作得很愉快。在“中央北迁”问题上，李宗仁认为，中央迁往武汉是大势所趋，但军队调遣，继续北伐，则应绝对服从总司令的指挥。1927年4月李宗仁参加了蒋介石在上海召开的“清党###”会议，支持蒋发动事变和在南京另组政府。宁汉分立之际，双方剑拔弩张，

势将火并。李宗仁从大局着想，派人前往武汉，提出宁汉双方分道北伐，会师北京后召开和平会议解决纠纷。在桂系的逼迫下，蒋介石第一次下野。李宗仁、白崇禧联合何应钦，以南京军事委员会作舞台，在龙潭战役中击败孙传芳大军。李宗仁的声望一时如日中天。接着，南京暂时形成由宁、汉及西山会议派联合而由桂系与西山会议派控制的中央特别委员会和由桂系控制的军事委员会。不久，蒋介石重回政坛，与汪精卫合流，特别委员会被解散。二次北伐时，李宗仁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武汉政治分会主席，指挥部队与蒋、冯、阎各军共同北进，直捣北京。1928年7月6日，四大总司令齐往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举行奉告典礼，宣告北伐成功。

李宗仁(2)

随后，李宗仁被国民党五中全会任命为军事参议院院长。

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后，并未消弭国民党派系之间的矛盾冲突。军队和地盘分配不均，最终酿成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内战。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桂系在战争中败北，李宗仁出走香港。这年秋冬之交，李宗仁取道广州湾返回南宁，与先潜回广西活动的黄绍?f、白崇禧重新聚首，共商善后，伺机再起。

此时，冯玉祥、阎锡山为反对蒋介石，采取联合军事部署。李宗仁遥相呼应，即在南宁成立“护党救国军”，自任总司令。1930年5月，蒋、冯、阎、桂大战爆发。李宗仁决定放弃广西根据地，挥军入湘，北上攻占武汉，与冯、阎会师中原。可惜，当他挥师北进时，其后路交通重心衡阳突为粤军蒋光鼐所占，部队顿被腰斩，首尾不能相顾。尽管李宗仁亲赴前线督战，终以缺粮，无法维持，不得不将部队撤回广西。

1931年5月以后，两广在胡汉民的旗号下再度合作，另立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与南京政府对峙。李宗仁等借此机会，大力抓广西建设，使广西成为当时著名的“模范省”。1936年5月，胡汉民病逝，两广实力派失去了重心，蒋介石乘机分化瓦解粤桂联盟。陈济棠、李宗仁等决定先发制人，打起“抗日救国”旗号，请南京中央准予“北上抗日，收复失地”。他们成立“抗日救国军”，陈济棠任总司令，李宗仁副之。接着，粤桂军队即向湖南出动，蒋介石急调中央军堵防，一场内战又将爆发。迫于国内人民一致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压力，最终两广事变和平解决。李宗仁、白崇禧被任命为广西绥靖正副主任，他们在广西励精图治，积极准备抗战。

全面抗战爆发后，1937年10月12日，李宗仁就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驻节徐州，指挥保卫津浦路的防御战。时值上海已失，南京危在旦夕。他从战略上判断：京沪战事一旦结束，津浦线必然是日军攻击

的重要目标。根据对形势的分析，他提出抗战的战略重点是“以空间换取时间”。

南京失守后，日军急欲攻占武汉，以迫使中国政府作城下之盟。但其时，日军主力还在北方，它需要将其机械化部队从津浦线开到陇海线，再沿京汉线直下汉口。于是中日战争的主战场转移到以徐州为中心的黄淮地区。到1938年2月，日军为迅速打通津浦线，南北对进，夹击徐州，拉开了台儿庄大战的序幕。

李宗仁侦知日军的意图之后，正确地分析了敌情。他抓住日军急于打通津浦线的骄狂心理，定下了“固守台儿庄及运河一线，诱敌来犯，断敌后路，相机实施反包围，聚歼日军”的作战方针。激战中，他亲上前线指挥，激励士气。经过殊死搏斗，取得台儿庄战役大捷，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振奋了中国军民的抗战热情，成为抗日战史上光辉的一页。

日军在台儿庄受挫后，其统帅部增调精锐部队30余万人，采取南北对进，侧翼迂回的战法，分六路向徐州实行大包围，企图速战速决，歼灭第五战区野战军主力。这时李宗仁为避免与优势之敌作消耗战，当各路敌军向徐州步步合围时，他令所部各路守军，作稍事抵抗后，即相机撤向山区、湖沼地区，进行“化整为零”的游击战，与敌人纠缠了月余。在力量不济的情况下，于1938年5月放弃徐州，但取得了歼敌3万余人的战果。至此，李宗仁充分运用内线作战的有利条件，与南北两路日军周旋了五个月零六天，粉碎了日军迅速打通津浦线的计划。随即将主力部队撤往西南山区，死守桐柏山、大洪山两个战略据点。他先后参加指挥了武汉保卫战、随枣会战，以及豫南、鄂北诸战役。

1943年秋，李宗仁调离五战区，任汉中行营主任，负责指挥第一、五、十战区。抗战胜利后，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主任。1948年4月，李宗仁不顾蒋介石的阻拦，坚持参加竞选，当选中华民国行宪后的第一任副总统。

李宗仁(3)

抗战胜利举国思治，民众期望和平建国。但蒋介石依靠美国援助一心想打内战，消灭共产党。李宗仁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是支持的。1927年4月发生在上海的那次血腥大屠杀，他是重要的策划和参与者。他被中共定为第二号“战犯”，不仅因为他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副总统，而且有过###的历史，又支持蒋介石打内战。

受人摆布的代总统(1)

在李宗仁就任副总统的这一年，国共两党军事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且这种变化还在继续之中。1948年10月，也就是长春解放的关键时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针对蒋介石集团面临土崩瓦解的恶劣情势，向马歇尔主持的国务院提出了五点建议，其中第二项即“是否可建议委员长退休，让位于李宗仁”，并悄悄地进行和谈活动，以期借此迫蒋下台。

不久，白崇禧忽然从汉口发出“亥敬”电(亥代12月；敬代24日)，呼吁蒋介石与中共恢复和谈。电云：“望乘京沪平津尚在吾人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和谈部署，争取时间。”30日，白又向蒋发出“亥全”电，重申前电主张。

蒋介石面临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各条战线上的致命挫折，不得不开始从财产转移、人事安排等方面作下野准备。

这年除夕，蒋介石在黄埔路官邸设晚宴，邀请国民党中央常委和其他军政要员吃“团圆饭”。他以低沉的语调说：“现在局面严重，党内有人主张和谈，我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不能不有所表示。现拟好一篇文告，准备在元旦发表。”并不时地用探询的目光看看李宗仁，而李宗仁却不动声色。蒋介石大为恼火，待张群把《文告》读完后，便直接询问坐在右旁的李宗仁对《文告》有什么意见。李回答说：“我与总统并无不同意见。”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声称“引退”。其实蒋介石并没有下野的准备。司徒雷登看到蒋发表《文告》后，迟迟不肯下台，非常焦急。1月17日，司徒雷登秘密前往李宗仁在傅厚岗的官邸，研究他们的燃眉之急。司徒雷登还没有落座，就气急败坏地说：“蒋介石先生也太不识时务了。作为一个绅士，我简直为他这种厚颜无耻的行为感到羞惭。《文告》发表半个多月，可他还是赖在总统的位置上，不肯滚蛋。”李宗仁很清楚，美国政府的这种态度，为自己

登上国民政府总统的宝座，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但他却采取“欲擒先纵”的策略，故意显得对于此事不十分热心。他说：“大使先生对中国的局势十分关怀，这是国人所共知的。至于蒋介石总统的进退，也只看局势的发展，听其自然。”1月21日，蒋介石在各方面的压力下，凄然地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务。李对这个“代”字极为不满，声称“名不正，便不就职”。白崇禧也说：“要做就做真皇帝，切不要做假皇帝！”但法律权威的结论是：“蒋先生辞职未经国民代表大会批准，李副总统继任总统也必须由国民代表大会追认，在法律手续未尽之前，李先生只是代行总统职权。”

李宗仁无可奈何，于1月22日就任代总统。他发表文告说：蒋介石“轸望国家之艰危，顾恤人民之痛苦，促成和平之早日实现，决然引退，宗仁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代行总统职权……决本和平建国之方针，为民主自由而努力”。这时李宗仁的最大愿望，就是企图与共产党两分天下，隔江而治。因此，他一上台，就积极进行“和谈”活动，以延缓国民党政权的垂亡。同时，整顿军队，加强实力，与中国人民解放军隔江对峙，分庭抗礼。然而，这仅仅是他个人的如意算盘。蒋介石下野之前，已准备放弃大陆，退保台湾。“引退”后，他在溪口建立电台7座，控制国民党的军政事务。

李宗仁上台的当天，为了表明企求“和平”的诚意，电邀李济深、章伯钧等共同策进和平运动；同时指示行政院作出决议，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f、彭昭贤、钟天心为和谈代表。23日，他听到中共广播关于和谈四条声明后，于第二天又指示行政院办理“七大和平措施”。27日，李宗仁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请迅速指定和谈代表与谈判地点，并谓南京“政府业已承认，以贵方所提的‘八项条件’作为和谈的基础”。

在这期间，李宗仁为落实其所谓“七大和平措施”，释放“###”，曾先后以“代电”和亲笔信指令参谋总长顾祝同负责释放张学良、杨虎城，而顾祝同却把这一事推给陈诚、张群。他只好又派程思远专程到

台湾与陈诚面商此事。陈与顾祝同一样，采取顾左右而言他的策略，对程思远说：“蒋先生的事你是了解的，像囚禁张学良这件事，他从来不使别人过问，所以我也不闻不问。”程知道释放无望，便返回上海。

受人摆布的代总统(2)

不久，人民解放军经过淮海战役后，已逐渐迫近长江北岸。2月，国民政府国防部召开江防紧急会议，李宗仁等主张将主力自南京向长江上下游延伸，江阴以下江面辽阔，不易强渡，可不必用重兵防守。而掌握实权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声言此方案大违总裁意旨，要将主力集中于江阴以下，以上海为据点，集中防守。并说："这是总裁的方案，我必须执行。"有的人认为这是自杀政策，在战略及战术上均属下策，与其争辩。汤却说："我不管别人，总裁吩咐怎么做便怎么做！"说着，把文件一推便冲出会场，扬长而去。李宗仁望着何应钦、顾祝同说："这局面如何收拾？"

在经济方面，李宗仁接过来的也是一个完全崩溃的乱摊子。原国库里的全部银元、黄金、美钞，蒋介石早已密令运往台湾。为了维持军政开支，李宗仁曾命行政院指示财政部，从台湾运回一部分银元、金钞备用，但负保存责任的陈诚，奉蒋暗示，竟充耳不闻，无言抗命。这样，李宗仁主持的国民政府便大量印发原已一文不值的"金圆券"，致使币价贬值一日千里，金融市场完全崩溃。

面对这种局面，李宗仁打算"致力促蒋出国"，企望掌握实权。在这之前，张治中与司徒雷登在南京有过多次接触。他们都感到"蒋在溪口操纵一切，实为南京政府进行和谈的障碍"，主张"劝蒋出国一行，以便李宗仁得以集中政府权力，推行其企求和平的政策"。后来，张治中和李宗仁也商讨过此事，都表示同意。因此，3月3日，张治中和吴忠信乘飞机抵奉化，来到溪口。蒋介石同他们寒暄几句后，就气急败坏地说："你们是来劝我出国的，报纸已经登出来了。他们迫我下野是可以的，要迫我亡命就不可以。下野后，我是个普通国民，哪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这里是我的家乡！"几句话就把张、吴的口封住了。

李宗仁看到促蒋出国不成，便着手改组内阁。正好这时，孙科提出辞职。李宗仁与白崇禧等商讨后，推举何应钦为行政院长组阁。何

于23日就职，第二天，召集行政院政务会议，重新指定张治中、邵力子、黄绍?f等为和谈代表，并推张治中为首席代表，成立代表团。4月1日，代表团飞抵北平，住在六国饭店。当晚，中共中央副主席、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设宴招待。随后，张治中等一面与李济深等接触，一面与林伯渠、叶剑英、聂荣臻、李维汉等联系及访谈，主要就战犯问题和渡江问题，一再交换意见。但是，李宗仁的主观愿望，还是坚持解放军不渡江，让南京政府盘踞半壁江山，徐图后计。这样，不得不将正式和谈时间推延。直到13日晚9时，才在中南海勤政殿正式举行了第一次和谈会议。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提出了《国内和平协定》。黄绍?f等将《协定》最后修改案带回南京后，住在溪口的蒋介石行使了最终否决权。李宗仁接着在备战和谈的第二次会议上作了悲愤激昂的讲话。他告诉黄绍?f说："你回北平告诉张文白，叫他向中共代表团力争，取消逮捕战犯这一条，我愿意以国民政府代总统的身份到北平去负荆请罪；内战罪责，由我一人承担，但不要再追究国民政府所属的军政人员过去的罪过。其他各条款，我们都愿承认，并认真执行……"实际上，掌握桂系军权的白崇禧已做出"只要中共坚持渡江便不能接纳和议"的决定。这对李宗仁又是一个制约，他不可能批准代表团在《协定》上签字。

4月20日午夜，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提出的在和平协定上签字的最后期限已经到了。2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联合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这时，李宗仁更加慌了手脚，一筹莫展。第二天，只好会同白崇禧等飞往杭州，与幕后操纵局势的蒋介石会晤。行前，他与白商议，要同蒋介石"摊牌"：在中共大军渡江以后，蒋、李只能择一负责领导政府，要么蒋复职，李出洋；要么蒋出国，让李拥有指挥军政的全部权力。可是，当李宗仁一到杭州，蒋介石就拿出一份电稿说："这是一份通电，准备由我们两人联名发出，声明共产党毫无诚意，和谈已经破裂，中国国民党政府昭告内外，将继续作战到底。"他不料蒋有此一手，就转

弯抹角地说："我是为和谈而来的，如果继续作战，最好还是总裁复职。"蒋那时注意到美国人的态度，无意复职，便拍着李宗仁的肩膀说："和谈由你负责，战争也由你负责。请你勉为其难，毋萌退志。"李宗仁无可奈何，悻悻然飞回南京。

受人摆布的代总统(3)

李宗仁返抵南京的当晚，城里已经是一片败退景象。他想到屡屡遭到蒋介石的暗算，不觉百感丛生，即与左右亲信商议，决定同蒋分道扬镳，各行其是。第二天，他乘“追云”号专机飞离南京，未去广州，而是飞往桂林。接连数晚，李宗仁与广西军政要员聚于私邸谈论时局。他们认为，失败已经注定，蒋介石必然凭借优势的海空军，退保台湾一隅，建立一个小朝廷。到那时，我们在大陆全部溃败，恐怕想进入台湾谋一枝之栖也不可能。一些军政头目联名向李宗仁提出：“广西省内尚和平稳定，桂籍军队亦尚有二三十万人，据险而守，与中共作有条件的和谈。”然而，李宗仁要与蒋介石分道扬镳，必须得到白崇禧的支持。4月18日，他派程思远专程去武汉，接白崇禧到桂林商事。白一见程思远，就指责李宗仁“庸而好自用”，一误再误，“是一个扶不起来的人”，经程苦劝，才同意回桂林。蒋介石见李、白之间已出现裂痕，便使出惯用的手法，拉拢白崇禧，分化桂系。后来，在白崇禧等人的压力下，李宗仁被迫前往广州。5月21日，他发表《告全国###》，重申“戡乱”到底的决心，号召“###到底”，在政治上又一次与蒋介石同流合污；在军事上，提出把汤恩伯部调往大庾岭一线，与解放军决一雌雄的部署。结果，上海解放，长沙起义，国民党军也按蒋的指示将通往广州的关卡全部放弃。蒋介石与李宗仁的关系又一次恶化。

9月中旬的一天，李宗仁特地打电话约蒋介石单独谈话。二人坐定之后，李宗仁对蒋介石说的第一句话便是：“今天我是以国家元首的地位来对你谈话。”他首先搬出国家的最高名器，就是要压制蒋的妄自尊大的心理，而服服帖帖地静听李对他的指斥。 李宗仁把蒋过去的过失和罪恶一件件地数给他听，并说：“你过去每把事弄糟了，总是把责任和过失推到别人身上。例如东北剿共的失败，徐蚌会战的全军覆没，你说是军队不听你指挥；又如发行金圆券，引起全国经济恐慌，人民

破产，自杀成群，你不躬自反省，反责备人民不拥护你的经济政策；再如你纵容特务，滥捕学生及爱国人士，引起舆论指摘，你不自疚，反说是本党同志不听你话所使然……凡此种种，真不胜枚举！”他接着说：“你此番已是第三次引退，你当时曾对张治中、居正、阎锡山、吴忠信各人一再声明，五年之内决不过问政治。此话无非暗示我可放手去做，改弦更张，不受你的牵制。但事实上你所作所为却完全相反。不仅在溪口架设七座无线电台，擅自指挥军队，且密令京沪卫戍司令汤恩伯亲至杭州逮捕浙江省主席陈仪，并擅派周?N接替。嗣到台湾之后，复命汤恩伯到福建挟持福建省主席朱绍良离闽，擅派汤氏代理福建省主席兼绥靖主任。凡此皆属自毁诺言、目无政府的荒唐行为！”蒋介石默坐听李历数其过失时，面色极为紧张尴尬。当李有所责问时，他只是支支吾吾，讷讷不能出口。最后竟含笑向李宗仁道歉，请他原谅。李宗仁言语已尽，不再多言，起身告辞，蒋也跟随下楼，送李登车而别。蒋、李终于割袍断义，再未晤面。

11月间，白崇禧所指挥的华中部队彻底溃败，李宗仁在政治上赖以生存的条件也就随之而消失。11月20日上午，他以胃病复发为由，从南宁乘专机飞往香港，当天就住进太和医院。此后，他又严辞蒋介石派出的几伙说客的劝告，于12月5日携其夫人郭德洁、长子李幼邻、次子李志圣及下属和秘书等十余人由香港飞往美国，医治胃溃疡。在李宗仁出国后的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大陆已经基本解放，回大陆已不可能，而去台湾无异于自投罗网，“恐欲求张汉卿第二也不可得了”。无奈他只有在美国暂居下来。

李宗仁赴美不归，还占据着“代总统”的名位，这让急需名正言顺地复职重当“总统”的蒋介石非常不满。台湾“监察院”、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一次次地致电李宗仁，促其返台，都被李宗仁一一借口回绝。1950年2月21日，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再电李宗仁，限其三日内返台，否则放弃“总统”职务，如不照办，则由蒋复职。3月1日，蒋介石在台湾宣布“复职”。李宗仁立即在纽约举行记者会公开指责蒋复职

是违宪之举。其实李与蒋打交道数十年，明知斥责无济于事，但他偏要做出“总统”的样子，不过是想保持一点尊严罢了。

受人摆布的代总统(4)

蒋介石在台复位，李宗仁决定定居美国，但他们的争斗仍在继续。当李闻知蒋欲做终身“总统”时，特于1954年1月致函蒋介石：

迩者，总统六年任期届满，正是吾侪还政谢罪之时，岂意私心恋栈，竟欲令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违法选举第二届正副总统，舆论哗然，国际侧目。中外人士，均认为此种选举，违法乱纪，决不可行。深望深长考虑，以免蹈袁世凯、曹锟之覆辙。

蒋介石对李的信不予理睬，他讨厌李在美国指手画脚，说三道四，于是指示“监察院”提出“弹劾副总统李宗仁违法失职案”，然后经“国民大会”投票表决，罢免了李宗仁的“副总统”职务。从此，李宗仁成了流落异乡的一介平民，与蒋介石的最后一丝联系也断绝了。

爱国思归的海外寓公(1)

李宗仁的“副总统”一职被台湾当局罢免后，他做起了“门前冷落车马稀”的寓公，生活渐渐平淡下来。除了星期天儿孙们来看望时享受天伦之乐外，平日只能靠读书看报打发日子。因为语言不通，他不能融入美国社会。1956年以后，他从纽约搬到新泽西的一所很简易的房子去住。这时他已雇不起厨师、管家，也招待不起客人住了。儿孙们也不大经常来看他了，客人越来越少，没有什么人和他开心地交谈，他只好在读书看报中度过漫长而寂寞的日子。这种生活对于习惯了繁忙的政治、军事生活的李宗仁来说，自然感到百无聊赖和难耐的孤独。

李宗仁自嘲自己在美国一直过着“厅长生涯”（厅即客厅）。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再加上经济上并不宽裕，语言又有障碍，因此，李宗仁每天出入小楼内外，除了搓麻将打牌，就是泡在客厅里看些华文报纸。195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的一些大学兴起了一股口述史学热。哥伦比亚大学派唐德刚博士负责《李宗仁回忆录》的采编与撰写工作。从1958年以后的五六年间，唐博士经常到李家访谈，与李商讨相关细节，这也多少排遣了李宗仁的寂寞时光。当回忆录脱稿后，李宗仁就又多了一项打发日子的“工作”——阅读自己的回忆录。

寓居美国的李宗仁每天都在关注着大洋彼岸的中国的变化。报纸报道大陆的建设，尤其是广西的矿山的开发，使其感叹“共产党真了不起”。新中国的几件大事也使他感到振奋：其一，中国人民志愿军将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赶回“三八线”以南，显示了中国军队的威力；其二，中印边界反击战中，把入侵者赶出边界，将所俘人、枪退给印度；其三，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他说，我们统治中国多年，连一部像样的自行车都造不出来，我们不得不服输。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亚非20多个国家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会议。4月23日，在8个国家的代表团总联席会议上，周恩来发

表了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声明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强烈反响。

李宗仁在报上看到周恩来的声明，深感兴奋。他认为，周恩来的声明，为解决台湾问题指出了正确的途径，凡属爱国之士，均应竭诚拥护，并为促其实现而共同努力。同年8月，李宗仁在美国发表了《对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一文，表达了一个炎黄子孙渴望祖国统一、民族振兴的心愿。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百废俱兴，建设规模之大和成就之速，实为史无前例。我国百余年来战乱频仍，民穷财尽。今日幸得有此和平建设的机会，这是国家从贫穷落后迈向繁荣富强的历史转折。”他指出，蒋介石在台湾侈谈“反攻复国”实为不切实际的滥调，认为台湾问题的正确解决只有两条路可循：一是国共和谈自行解决，二是美国撤走第七舰队，保证台湾地区实行非军事化。在建议中他还表示，个人恩怨，早已置之度外；惟愿中国日臻富强，世界永葆和平，别无他求。

这个《建议》引起的反响是强烈的。台湾骂他“为###张目”，香港有人说他“年岁高而糊涂了”。而周恩来看到这个消息后马上敏锐地意识到：这是自1949年以来，李宗仁在政治立场上的首次重大转变。

1962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为维护领土完整，对印度的挑衅进行了自卫反击。帝国主义颠倒黑白，借此进行猖狂的反华活动。针对当时的时局，李宗仁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对中印边界问题的进一步探讨》一文，指出：自古以来西藏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尼赫鲁派兵入侵中国边境又拒绝与中国谈判划界，其动机无非是想利用边界问题解决内部困难和想利用中印冲突来争取美援。美国朝野抨击中国对西藏行使主权，这样对美国毫无裨益，徒伤中国人的感情，宜三思之。

爱国思归的海外寓公(2)

1963年夏，李宗仁在接受意大利米兰《欧洲周报》记者奥古斯托?玛赛丽采访时坦言：“我不是共产党，甚至也不喜欢共产党，但是我不否认今天共产党为中国所做的事情。我宁愿继续做一个诚实的人和可怜的政治家，但我不能不说实话，中国从来没有像现在组织得这样好。……我像蒋介石和国民党一样，是一个失败者。唯一的区别是，我完全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作为个人来说，我无关紧要，我不能妨碍中国的前途和她的进步。我由于自己的失败而感到高兴，因为从我的错误中一个新中国正在诞生。”

1964年2月，中法建交。李宗仁于2月12日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劝告美国政府效法戴高乐政府调整对华政策，以期奠定东亚和平。从1950年代中期以后十来年李宗仁的言行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已经有了质的转变，由长期坚持###立场转到心系祖国，渴望祖国统一富强。促使他转变思想的原因，一是他内心固有的爱国情感，二是新中国的稳定发展和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还有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统战政策。

1956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百业兴旺，前途一片光明。当年1月，周恩来在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时鼓励海外知识分子为国家建设和统一作出贡献。2月，全国政协全体会议号召台湾同胞和一切从大陆跑到台湾和海外的人员，站到爱国主义的旗帜下来，同祖国人民一起为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此时居住在香港的一直是李宗仁的智囊人物的程思远先生流露出有返回祖国的意向。1956年4月28日，程思远回到首都北京，受到周恩来的亲自接见。周恩来对程思远说，我们国家当前的对内对外政策，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为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按照这一方针，我们主张爱国一家，团结对外，以诚相见。希望海外知识分子要充分了解祖国发展的

情况，我们国家是大有可为的。谈到李宗仁时，周恩来说，李宗仁先生去年发表了一个声明，反对搞“台湾托管”，反对“###”，主张台湾问题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这是李先生身在海外心怀祖国的表现。我们欢迎李先生在他认为方便的时候回来看看。

程思远怀着兴奋的心情把回国经过写信告诉了李宗仁，并转达了周恩来的话，这在李宗仁的内心中激起了难以平静的波澜。1957年秋，程思远的女儿程月如去美国留学，每逢周末，她都到李宗仁家做客。见到自己旧部的女儿，李宗仁十分愉快。他写信给程思远说：“一晤月如，如见亲人，一种思乡怀旧之情，顿时浮现心头，久久不能平息。”不久，李又写信给程说他保存着一些文物，希望能献给祖国，实际上是在试探中共对他的态度。当程思远1959年国庆期间第二次到北京时，他向周恩来汇报了几年来李宗仁的动态。周恩来说：“德邻先生出于爱国热忱，要向国家捐献一些文物，政府表示赞赏。至于他有叶落归根的意愿，希望他到欧洲先同你谈谈，然后再做决定。”

1960年秋，李宗仁为对欧洲之行进行部署，特让夫人郭德洁到香港和程思远商量。为了摆脱美蒋特务的盯梢，商定会面的地点在瑞士的苏黎世。经过长期的商量与筹划，1963年5月14日，李宗仁遵照周恩来深谋远虑的安排，离美赴欧旅游。当他从纽约机场一上飞机，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两名高级侦探就形影不离地跟踪上了。但在四个多月的旅游期间，两名侦探弄得筋疲力尽，并没有发现李宗仁任何可疑行动。到了苏黎世，两名侦探便跑到日内瓦寻欢作乐去了。这时，程思远赶来与李宗仁会晤。两人见面之顷，千言万语一时涌上心头，不知从何说起，毕竟十四年没见面了。两人在一家僻静的咖啡馆坐下，彼此畅谈阔别后的情形。李宗仁说，树高千尺，叶落归根。人到晚年，更思念祖国。程思远向他转达周恩来对他的问候和“四可”的意见：第一，李先生可以回来祖国定居；第二，可以回来，也可以再去美国；第三，可以在欧洲暂住一个时期再定行止；第四，回来以后可再回去，如果愿意回来，可以再回来。总之，来去自由，不加拘束。李宗

仁听完就说：我只要一可，回到祖国定居，安度晚年。12月22日，他又如期返回美国。1965年3月间，毛泽东根据国内外形势，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周恩来于是开始筹备迎接李宗仁先生回国的工作。4月22日，李宗仁到纽约郊区华克城移民局申办出境旅游签证，说要去欧洲小住，为期三个月。他对外界说是因为夫人郭德洁有病，已不能做饭了。为着吃饭方便计，他们恐怕只能搬到瑞士开餐馆的“舅爷”家附近去住，好就近在餐馆寄食。移民局知道他两年前去过欧洲，并且在圣诞节前赶回美国，因此很快为他办了签证手续。

爱国思归的海外寓公(3)

6月13日，李宗仁再次离美飞欧。23日，郭德洁处理完余下的事情后，也飞抵瑞士。这将是他们回国的第一程。程思远接到李赴欧的电报后，第五次上北京听取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领导向他传达周恩来对李宗仁回国一事所作的具体指示（当时周在非洲访问）。

6月28日，程思远到了苏黎世，与李宗仁夫妇会合。为了不致暴露目标，他们住在郊区。但是嗅觉灵敏的美蒋特务还是探知了李宗仁的意图。他们派人拿着白崇禧发给李宗仁的劝其“保全晚节”的电报，到苏黎世阻止李宗仁回国。倘若劝阻不成，不惜采用暗杀的故伎。李宗仁原打算等次子李志圣赶到后一起回国，忽然接到紧急通知，要他们务必于7月13日下午2时前离开苏黎世飞往巴基斯坦的卡拉奇。这样，台湾来人就没有遇到李宗仁。蒋介石又密令其驻卡拉奇的特务机构暗杀李宗仁一行。这时，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基斯坦###共和国的特命全权大使，也收到了从北京发出的急电。国务院的领导同志指令：要万无一失地保证李宗仁一行的生命安全。大使馆与巴基斯坦官方联系，得到巴总统的支持。3日凌晨，李宗仁所乘坐的道格拉斯式客机在卡拉奇国际机场刚一降落，一辆巴基斯坦保安部的警车，立即把他们接到了中国大使馆。蒋介石的暗杀阴谋破产了。

在李宗仁到达卡拉奇的第二天，也就是7月14日，香港《快报》在头条位置发表了彩色标题新闻《李宗仁将返大陆》。

7月17日夜，在巴方的密切配合下，中国驻巴大使丁国钰陪同李宗仁和程思远，将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一架飞往广州的波音707客机的头等舱全部包下来，零时13分，飞机从卡拉奇机场起飞，在夜色中向中国的领空飞去……

备受礼遇的多情老人(1)

当历史定格在1965年7月20日上午11点时，在首都北京机场，一架专机徐徐停稳，这时舷梯上走下一位特殊的客人，他就是栖身海外十六年的原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先生。看到机场上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场面，李宗仁百感交集，禁不住热泪盈眶。周恩来、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郭沫若、叶剑英、傅作义、李四光等党和国家、政协、军队的领导人在机场迎接，李宗仁的昔日老友和部下卢汉、邵力子、黄绍?f、刘斐、屈武、刘仲容以及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廖耀湘等，还有末代皇帝溥仪，也都到机场欢迎他的归来。中国封建王朝的末代皇帝与中华民国的最后一位代总统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大家庭里相互握手，这是多么富有历史意义的一幕啊！

李宗仁在机场大厅欢迎仪式上宣读了《归国声明》，他说："在国内外一片大好形势中，我已从海外回到人民祖国的怀抱里来了。……我以海外待罪之身，感于我国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英明领导之下，国家蒸蒸日上，……凡是在海外的中国人都深深为此感到荣幸。我本人尤为兴奋，毅然从海外回到国内，……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亟盼海外友好乘时奋起拥护祖国，幡然归来，尤未为晚。"他还寄语在台湾的国民党军政同志，"凛于民族大义，也与我采取同一步伐，毅然回到祖国怀抱，团结抗美，一致对外，为完成国家最后统一作出有用的贡献"。李宗仁回国后，先是被安排住在北京饭店，后来搬进了一个院落。到京当晚，周恩来总理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并设宴欢迎李宗仁、郭德洁夫妇。此后的一段时间，李宗仁不是被中###政领导人、各民主党派、团体和旧友宴请，就是被安排在北京地区参观。

7月26日上午，毛泽东，中共中央主席；李宗仁，原中华民国代总统，两位历史人物的手握到了一起。宾主的交谈幽默而愉快。当李宗仁谈到海外的许多人都怀念伟大的祖国，都渴望回来时，毛泽东

说："跑到海外的，凡是愿意回来的，我们都欢迎，他们回来，我们都以礼相待。"

毛泽东还说："你在声明中没有骂蒋介石，这很好。将来蒋如果愿意回来，我们更高兴，更欢迎。"

最后，毛泽东建议李宗仁到全国各地去看一看。

9月26日下午3时，李宗仁在全国政协礼堂三楼举行盛大中外记者招待会，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名记者出席。在招待会上，李宗仁畅谈了他回国两个多月来的观感，并发表了对当前时局的看法。他说，自回国以来，他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热烈欢迎，优礼相待，开诚相见，关怀备至。他对此内心感动，毕生难忘。他认为，目前我国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不仅为百年来所未有，且为中国史无前例的新气象。孙中山先生所创立的革命三民主义理想已完全实现，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大道上向前迈进。事实上已超过孙先生当年的理想。

李宗仁说："一百多年来中国受尽了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欺侮。帝国主义者说中国人是'东亚病夫'，一盘散沙。但是现在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六亿五千万人民已经完全觉醒，团结得像一家人，显示出空前无比的威力。现在我们不是'病夫'了，而是巨人了！我这个75岁的老人也感到很自豪。"

有记者问："李先生是不是马列主义者？"

李宗仁回答说："我不是马列主义者，而是个爱国主义者。"

10月1日国庆节，李宗仁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

此后，李宗仁夫妇在中央统战部同志陪同下到各地参观，还重游了广州、广西故地。每到一处都受到当地党政领导同志的热情接待和周到安排。李宗仁目睹了祖国发展的情况后，感慨万千。他说："百闻不如一见，新中国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

正当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兴致盎然地在广西故地重游时，死神却一步步向郭德洁逼近。1966年3月21日，郭德洁因乳腺癌晚期医治无

效，在北京去世，享年60岁。老年丧妻，对李宗仁打击很大，他的情绪一直十分低落，有时睹物思人，悲情满怀。考虑到李宗仁孑然一身，生活不便，程思远和民革中央秘书尹冰彦酝酿着给他再找个伴儿。

备受礼遇的多情老人(2)

经过一番查访再加上事有巧合，一个在北京积水潭医院当护士的27岁的胡友松走进了李宗仁晚年的生活。交往一段时间之后，胡友松被李宗仁的传奇人生和人格魅力所吸引，逐渐产生了对李宗仁的爱慕之情。在周恩来和国务院有关同志的关心下，7月26日，76岁的李宗仁和27岁的胡友松在北京西总布胡同5号举行婚礼，结成了轰动一时的老少配。婚后老夫少妻的生活过得甜蜜美满。

这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对于“文化大革命”，起初李宗仁认为这既然是毛泽东发动的，肯定自有他的道理，因为毛泽东是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伟人，伟人自有伟人的高明之处，他所指挥的事情是不容怀疑的。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一连串事情，着实让李宗仁感到迷惑和不安。

在“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下，李宗仁的几个旧友黄绍?f、黄琪翔、刘斐等人及其家人都受到了红卫兵的冲击和凌辱。黄绍?f被红卫兵抽打罚跪后，不堪受辱，自杀身亡。李宗仁得知这一消息，不禁感到心寒。他有一种预感：厄运很快就会降临李公馆！他想去找章士钊一起去见毛主席问问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章士钊说：万万不可，我们已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还是谨慎为好。李宗仁的预感终于发生了。一天，他和胡友松坐车出门理发之后去医院买些药，结果遭受意外，胡友松差点儿被红卫兵从车上揪出来，说要“打倒资产阶级的少奶奶”，吓得他们再也不敢随便上街。还有一次，6个红卫兵冲进了李公馆，经过李宗仁的耐心说教，倒也相安无事。

这些事让周恩来知道后，决定对党外的民主进步人士采取特别的保护措施。9月19日，李宗仁夫妇被秘密送往解放军301医院保护起来。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他们都用了化名，李宗仁叫李敬之，胡友松叫唐伟。301医院里还住着章士钊、张治中、程潜、傅作义、何香凝等人，不过大家并不能随便走动或任意交往。在那段动荡的日子里，这

些高级民主人士在这里度过了一段特殊的时光。李宗仁每天除了看报、听广播、浇花之外，剩余的大部分时间就是给胡友松讲故事，讲他在南征北战中如何出生入死，讲他与蒋介石的恩恩怨怨，讲他寓居海外如何思念故土，讲他与家人的悲欢离合……

对于李宗仁来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使他制定的一项计划被迫搁浅。回国后，李宗仁备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礼遇，他对共产党不计前嫌的宽宏与大度十分感激。另外，通过参观，他看到新中国正在蒸蒸日上，甚为振奋。因此，他想给祖国出把力，通过自己的影响再召回一些留在海外的朋友，让他们也和自己一样回到祖国的怀抱，来共同从事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事业。他把这些人列了一个名单，其中有留居港澳的桂系上层人士黄旭初、夏威等，有卜居美国的吴尚鹰、甘介侯和住在墨西哥的毛邦初等人。李宗仁将这些人的名单给周恩来看了，周说，除了甘介侯之外，其他的人我们都欢迎。为此，李宗仁还为黄旭初和夏威汇去了回大陆的路费，并托尹冰彦向吴尚鹰、毛邦初寄去了问候和邀请的信函。可这一切都因“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而被迫搁浅了。

1966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周年的庆典，毛泽东要在天安门城楼亲自接见红卫兵。李宗仁（请柬上写的是李敬之）再次受邀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出席观礼和接见活动。周恩来问起李宗仁的生活和身体情况，李宗仁一边感谢，一边动情地说：“多谢总理。总理，你也要多保重身体啊！”毛泽东接见过红卫兵后，特意同李宗仁握手，对李说：“请多保重身体，共产党不会忘记你的！”

1968年以后，随着年事渐高，再加上文革中的一些不顺心的事，李宗仁的身体每况愈下。4月，李得了肺炎。住院期间，发现大便出血，开始以为是痔疮破裂，漫不经心。8月初，大便时大量出血，才重新入院检查，结果确诊为直肠癌。于是进行割治切除，手术后恢复良好。9月下旬出院，迁居西总布胡同休养。

备受礼遇的多情老人(3)

9月29日，李宗仁在家中收到了国务院送来的两张请柬，是以周恩来的名义发来的。一张是让他9月30日下午6时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庆十九周年国宴；另一张是请他到天安门城楼参加10月1日的国庆观礼活动。

看到请柬，李宗仁十分高兴，因为这是国家给他的无上荣耀啊！可是胡友松很担心，怕他身体受不了，劝说道："德公，这两场活动，你就别参加了。我们让人把您的身体情况向总理说清楚就是了。" "万万不可，总理请的，我一定要去。"李宗仁态度坚决。

9月30日晚，李宗仁如期出席了国庆宴会，但不到两个小时就感到腹痛难忍，浑身发冷，体力不支，只好提前回家。第二天，他没能参加观礼活动，而是再度被送进医院，并且这一去就再也没能回来。日后周恩来对程思远说，当时发给李先生两张请柬，一是出席宴会，一是上天安门，原只是要他10月1日到天安门亮相一下，立刻回家休息，不必参加国宴。可是那个指示没有能够清楚地贯彻下去。1969年1月17日，李宗仁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把胡友松和尹冰彦叫到自己身边交代了一些后事。他躺在病榻上，面庞清瘦，神智倒是十分清醒。他说："我的日子不会再有多久了，我能够回来死在自己的国家里，这是了却我一件最大的心愿……回来以后，本想在台湾问题上做些工作，现在什么都来不及了。台湾是要统一的，可惜我看不见了。这是我没有了却的一桩心事。那些书（指李带回的很多线装书，如《二十四史》《四库备要》等等）送给广西图书馆，书画送给政府。还有几瓶酒（历经二百多年的法国白兰地和英国威士忌），我想把它送给毛主席和周总理。"

李宗仁又单独向胡友松交代了一些后事，末了他说："我去了以后，没有别的要求，只要记得清明节别忘了给我扫墓，让世人知道，李宗仁还有这么一位年轻貌美的妻子……"

交代完这些后事，他又让尹冰彦把程思远叫来。程思远来到医院，李宗仁口述请他代笔写了一封给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信，信中说：“我在1965年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所走的这条路是走对了的。这些年来，我亲眼看到我们祖国的潜力是举世无匹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深深地感到，能成为中国人民的一分子是一个无比的光荣。在我快要离开人世的最后时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士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他们目前只有一条路，就是同我一样回到祖国的怀抱。”

1969年1月30日午夜的钟声刚刚响过，时针指向凌晨零时50分，李宗仁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这位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颇有影响的政治人物终于走完了自己七十八年的生命旅程。

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周恩来在李宗仁的遗体旁默立了好长时间，然后对大家说，他看了李先生写给主席和他的信。李先生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台儿庄，一是回国。他说，李先生的信是一个历史文件。

妻子们和儿子们(1)

李宗仁一生有三位夫人，她们是李秀文、郭德洁和胡友松。

李秀文，1891年生，广西临桂人，出身农家。1911年与李宗仁结婚，1918年2月生子李幼邻。李宗仁娶了郭德洁之后，她基本上与李宗仁分居，只保持名义上的夫妻关系，一心一意抚育幼邻。1949年4月至1952年秋，她寄居香港。为了与定居美国的儿子住在一起，她辗转到古巴住了五年半。1958年5月，在饱尝了离别之苦后，李秀文终于与儿子团聚了。1965年李宗仁回国临行前一个月，专程到李幼邻家与李秀文母子话别。他先向母子二人表示歉意，然后告诉他们自己决定回国定居，要他们万万不可泄露出去。最后他语重心长地对李秀文说："人说老来思乡，落叶归根，一点不假。我的一生，原来是四海为家，想不到也有思乡怀归的一天。如今深感去国之苦，苦不堪言。"他劝李秀文："你年纪也大了，还是回中国定居快乐地安度晚年罢。你在此言语不通，不能自己出外，又没有朋友来往，生活是很枯燥的。"李秀文说她将来会如他所嘱回祖国养老。

1973年，一个三代同堂的家庭不幸解体。李秀文的孙女们大学毕业后各自立业，儿媳珍妮因与李幼邻意见不合而异地分居。孙女走了，儿媳离去了，儿子每天早出晚归，忙于事务，留给李秀文的则是一片寂寞。往事如烟，李宗仁的嘱咐时时萦绕在心头，李秀文思乡之情越来越浓。

就在这一年的10月31日，在离国二十多年之后，李秀文回到了祖国，邓颖超和廖承志亲自接见了她。以后李秀文回到桂林定居，与侄子李嘉球和侄媳谭明一起生活。她被选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委员、桂林市政协常委。

1992年6月18日，这位百岁老人谢世。知足常乐，宁静淡泊，李秀文就是靠着这样的心境走完了她的一百零二年人生。

李秀文常和侄媳谭明聊天到深夜，回忆、诉说自己的经历，谭明根据她的口述整理为《我与李宗仁》一书，向世人介绍了李秀文的一生。

郭德洁，1907年生于广西桂平，原名郭月仙，郭德洁是她与李宗仁结婚后改的名。月仙自幼聪慧过人，性格与一般女孩子皆有不同，上中学时就立志要做“出类拔萃的女人”。1924年，郭还在桂平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期间，被时任定桂军司令的李宗仁看上，郭也仰慕李的威名，正所谓英雄爱美人。18岁的郭德洁嫁于李宗仁后，一直陪伴在其身边，完全取代了李秀文，成为李宗仁的夫人。李宗仁征战南北，她一直追随陪伴，并频繁出入各种公众政治场合。郭德洁还是一个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新时代女性，她积极投身教育事业，先后借助李宗仁的力量在桂林等地办学，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1948年4月，郭德洁全力帮助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成功，荣登副总统夫人的高位，可谓志得意满。1949年底她随李宗仁寓居美国，后来加入了美国国籍。她起初不愿回国，但李宗仁回国意志坚决，又加上自己身患癌症，她不想死后葬身异国他乡。因此，她选择了和丈夫一道回国。回国后他们夫妇受到崇高的礼遇。

1966年3月21日，郭德洁因病去世。由于是秘密回国，无法顾及国籍问题；回国几个月来，又整天忙于参观与会见亲朋好友，更顾不上解决国籍问题。此时，她应该还是美国公民，而中美之间还没有邦交，我们不能为一个美国公民举行追悼仪式。于是，寻求法律程序，为她办理归宗手续。征得李宗仁先生的同意，在郭德洁的一个手提箱里找到她的美籍身份证，由国务院办理了归宗手续，使她成为了合法的中国公民。3月23日上午，在北京医院举行了有周恩来、彭真、李四光等人参加的向郭德洁遗体告别仪式。遗体火化后，骨灰盒存放于北京西郊骨灰堂。同舟共济，风雨相伴，从1924年到1966年，郭德洁伴随着李宗仁走过了四十余年风雨历程。

胡友松，1939年出生于南京，幼名若梅，是影星胡蝶的私生女。1947年被养母沈文芝（曾是张宗昌的姨太太）带到北京读书，1959年毕业于北京第三护士学校。由于家庭出身不好，几次谈对象都被干扰破坏，到27岁还未婚嫁。与李宗仁结合后，一直精心照料李的生活。在李宗仁遗体告别仪式结束后，周恩来握着胡友松的手说：“别难过，抢救无效。你放心好了，国家会照顾你的。”

妻子们和儿子们(2)

李宗仁去世后，胡友松的生活也一波三折。因为身份特殊，又处在文革期间，她备受艰辛，曾坐过牢，被下放劳动。1972年5月，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她化名王曦，进北京无线电元件九厂当了一名检验工，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后来她被调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工作，直到1989年8月退休。

退休后的胡友松先后向桂林文物部门和台儿庄李宗仁史料馆捐赠了李宗仁的一些珍贵遗物。1998年4月，胡友松接受枣庄市台儿庄区人民政府的邀请，到台儿庄定居，出任李宗仁史料馆的名誉馆长。晚年的胡友松一心向佛，潜心作画，生活得很充实。

李宗仁有两个儿子。长子李幼邻，1918年生于广东新会，1937年留学美国，1942年获得芝加哥大学军事管理专业硕士学位。但他并没有秉承父志，不但政见上有所分歧，事业上也各走不同的道路。他不愿借助父亲的权势去谋取一官半职，对国民党的官场腐败也非常反感。1947年因父母思子心切，他携妻女回国，在上海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工作了三个月便辞职不干了，又到香港与友人合作办厂。1949年12月护送父亲到美国治病，从此定居纽约。1973年10月底，送母亲李秀文回国，自己仍返美国经商。以后多次回大陆探母和观光，并积极地在华侨中宣传祖国的变化和共产党对海外人士的政策。1993年5月中旬，李幼邻病逝。其妻珍妮，为美国一混血女子，生有4个女儿，分别叫玛茜、雷诗、文迪、琴妮，均生活在美国。

李宗仁的次子李志圣，1937年生，据说是李宗仁与女秘书的私生子，因郭德洁不曾生育，就算是郭德洁所出。12岁随父母一起到了美国。李宗仁和郭德洁回国后，李志圣同长兄李幼邻住在一起。大学毕业后，在美国一家公司担任广告设计的职务。妻子龚怀磊，四川人，在纽约一机关供职。有一子一女，名字分别叫国钦、珍珍，家庭幸福美满。

参考文献：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程思远：《李宗仁先生晚年》，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

文思主编：《我所知道的李宗仁》，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

郭彬尉：《蒋介石与李宗仁》，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

李秀文口述、谭明整理：《我与李宗仁》，时代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程冠军：《忘年之恋：李宗仁与胡友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

王晓明主编：《中国八大总统之谜》，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

张福兴、王运发：《国民党败将沉浮录》，军事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沉度、应列等编：《国民党高级将领传略》，华文出版社2005年版。

魏宏运主编：《中国现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执笔：陈芳富）

陈 诚

陈诚（1898—1965）从军旅起家，曾经担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参谋总长等职。去台后，任国民党台湾省政府主席、台湾警备总司令、“行政院”院长、“副总统”、国民党副总裁等职。他忠实执行蒋介石的决定，对台湾经济发展也作出了贡献。同时，他坚决反对美国制造的“###”主张。晚年，他表示要对历史作出交待，遗嘱中已不提“###”与“反攻”。

步步高升(1)

陈诚，字辞修，号石叟，浙江省青田县人。1898年1月4日出生，先后入高市小学、丽水浙江省立第十一中学和浙江省立第十一师范学校读书。1918年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被编入第八期炮科。1922年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被分配至浙江第2师第6团任少尉排长。

1923年3月，陈诚随邓演达去广东参加革命，在邓任团长的建国粤军第1师第3团任上尉副官，旋调上尉连长，负责警卫大元帅府。5月陈诚随孙中山出征西江沈鸿英叛军，在作战中胸部负伤，幸为邓演达亲自率部抢救而脱险。他在肇庆医院养伤、治疗期间，适逢大元帅行营参谋长蒋介石来院慰问伤员。这是陈诚与蒋介石匆匆而过的第一次接触。9月，陈诚伤愈，升任师部独立连少校连长。

1924年春，黄埔军校成立。陈诚不计官阶，随邓演达到该校任教育副官之职，官阶上尉特别官佐。在这里，26岁的陈诚，因一个十分偶然的机会，为日后的官运亨通打开了门径。一天晚上，他因一时不能入睡，便带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一书到操场练习单杠，恰巧遇到散步的校长蒋介石。蒋随手拿起《三民主义》翻阅，只见上面圈圈点点，显然已被认真阅读过，于是对陈诚大加赞赏，并询问了其姓名、单位，还作了记录。操场的奇遇，成了陈诚发迹、一生追随蒋介石的开始。

不久，广州大本营组成了东征联军，###陈炯明，陈诚被任命为校军炮兵第1营第1连上尉连长。1925年2月中旬，陈诚的炮兵连在棉湖之役中大显神威，将叛军火力压倒，使战局转危为安。棉湖一战，默默无闻的陈诚受到了蒋介石、何应钦的赞赏。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决定出师北伐，组成了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陈诚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中校参谋。1927年四一二政变时，蒋介石曾召见陈诚，询问其态度。陈诚表示绝对服从蒋的指挥，由此更与蒋

走近了。随后，陈诚被任为21师师长。龙潭战役时，陈诚带病上阵，与孙传芳军展开血战。因为他坐轿上战场，战后被何应钦免了职。

1928年初，蒋介石复出。4月，蒋任命陈诚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警卫司令。陈诚就任警卫司令后，大力扩充实力，共组建三个警卫团，节制两个炮兵团，指挥两个宪兵团，其实力超过杂牌军的一个军。1929年春，蒋任命陈诚为11师师长，中原大战后再升为十八军军长。由此，陈诚在蒋军中的地位正式确立。汉字“十一”合为“土”，“十八”合为“木”。陈诚因此被戏称为“土木系”出身。在国共关系破裂后，陈诚参加了对红军的多次围剿，并屡吃败仗。1932年在黄陂、宜黄两次战役中，他的部队被红军大包围攻击，一个师长被打死，一个师长被俘虏，官兵伤亡2万人，部队溃不成军。但蒋介石并未追究，反而迅速给予整补。1934年第五次对中央苏区的围剿中，他在蒋介石的指挥下，率部先后占领中央苏区的广昌、建宁、石城、宁都等地，为蒋立了大功。这年7月，陈诚还被任命为庐山军官训练团副团长，蒋介石亲任团长，负责轮训各地的高级军官。由此，陈诚开始在各种不同场合，担任蒋介石的副手。以至西安事变中也与蒋同时被囚。陈诚的忠诚使蒋有意培养陈诚的迹象逐渐显露。

抗战爆发时，陈诚正在庐山举办军官训练团。因战事日紧，训练团于1937年8月中旬提前结束。考虑到日军如在华北得势，必将利用其快速装备沿平汉路南下直扑武汉，于我不利，不如扩大上海战事以牵制之。蒋介石表示“一定打”。陈诚也说：“若打，须向上海增兵。”蒋当即发表陈诚为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并增调部队赴沪参战。8月22日晚，日军以大将松井石根为司令官，率第3、11师团等部，在吴淞、川沙强行登陆。陈诚率第十五集团军进行阻击。但日军主力还是登陆成功。他看到敌军增援不绝，未能将敌压迫在江中而歼灭，已失去战役初期的主动权，便建议转移阵地，逐次抵抗。9月17日，中国军队即退守北站、江湾、庙行、罗店、浏河口一线，转入防守。10月11日，日军为控制大场、南翔，以断闸北、江

湾、庙行中央作战军归路，向蕴藻滨发起攻击。这时，中国军队的第五军，及第171、173、174和176师，正被陆续输往上海。经过三日激战，我军被迫后退，撤至苏州河南岸到小南翔一线。11月5日拂晓，日军在强大炮火配合下，从杭州湾乍浦东北之全公亭、金山卫、漕泾等处登陆。蒋介石电话询问陈诚如何处置，陈诚提出要调整战线。但为时已晚，日军迅速分路直扑松江，对淞沪守军实行迂回包抄。但蒋介石还是命陈诚再坚持三天，结果使淞沪守军完全陷于腹背受敌状态。8日晚，第三战区司令部下令撤退。11日，上海沦陷。淞沪一战支持约三个月之久，使狂妄的日本不敢再以“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眼光来轻视中国。

步步高升(2)

南京失守后，国民党的军政领导机关大部分迁移武汉。武汉是中国内地水陆交通枢纽，成为当时抗战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此时陈诚担任武汉卫戍总司令部总司令、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负责武汉保卫战的指挥工作。他还担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与文化界人士及中共代表合作，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抗战文化的发展。在军事上，他认为南京弃守后，武汉即是敌人势在必取的唯一目标。保卫武汉战略要点，应以三镇为核心，使其灵活运用，发挥抗战的最大力量。按军政合一原则，陈诚还兼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之职。

1938年7月22日夜，日军波田支队从鄱阳湖滨的姑塘登陆，继而侵占九江。紧接着以5个师团分左右两路，夹大江两岸向西展开猛烈攻势。陈诚第九战区与李宗仁第五战区分守南北二路，第九战区负责对付鄱阳湖沿岸及田家镇要塞以东地区来犯之敌。所辖薛岳第一兵团25个师在南昌至德安附近鄱阳湖沿岸一线组织防御，阻敌西进；张发奎第二兵团40个师在九江以西至幕阜山、九宫山一线组织防御，阻敌沿长江进攻武汉。陈诚令李汉魂的第二十九军团撤至庐山两侧及南浔路一带，依托有利地形，与向南昌进攻的敌左路军相持一个月之久。在薛岳指挥下，取得重创日军第106师团的万家岭大捷。8月10日，第二兵团的第三军团，在瑞昌东北一线与登陆的右路日军波田支队激战两星期。后来，日军以主力第9、第27师团，在数十架飞机掩护下，分三路合击瑞昌，并施放毒气，致第三军团伤亡惨重。经过四个月的节节抵抗后，陈诚奉蒋介石命令，按预定计划，于10月25日将部队全部撤出武汉，退至江西、湖南两省的永修、幕阜山、岳阳以南一线。

武汉沦陷后，陈诚将九战区军事交由薛岳代理，自己赴渝请训。

1939年9月，日军以赣北、鄂南两路策应湘北主力军，会攻长沙。陈诚奉命和副总长白崇禧抵湘，协助薛岳代长官指挥作战。出发前，他曾提出长沙“守”与“不守”两条，奉批“不守”。因此，一到达渌口，

就将蒋介石的旨意转告给薛岳。薛不以为然，说："长沙不守，军人之职责何在？"虽一夜之间，九次电话命薛退出长沙，而薛不听。陈诚怕彼此争论过久有碍戎机，在向薛询问部队的情况后，乃一面与白商定，命薛岳反攻；一面将薛之决心及当时情况报告蒋介石。结果，取得了湘北抗战的第一次胜利。

陈诚在抗战中，转战八年，悉心指挥，为打击日本侵略者、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陈诚在主持军政工作中，向以雷厉风行的作风而闻名。他处理问题坚决果断，不徇私情，不留情面。抗战中陈诚主政湖北，在军务倥偬中偶尔问政，竟断了几个"大案"。监利县长黄向荣，用公款做棉花生意，被省参议员傅鹤琴向陈诚作了检举。陈诚立即将黄逮捕法办。省保安司令部的人与黄的关系较好，又同情其乃初犯，所以延迟半年，迟迟未办。1943年陈诚调任远征军司令长官，动身前夕，省保安司令部将拟判黄十二年徒刑的判决书，匆匆送陈审阅，意欲保黄过关，免其一死。不料陈诚阅后，勃然大怒，拍着桌子连骂几声"混蛋"，在签呈上赫然批了四个大字："即予枪决"。原想成全黄的一纸签呈，反成了送黄入地的催命书。黄在临刑前，抽出钢笔给妻子写下四句遗言："杀我吓人，死不甘心，教我子孙，再莫做官。"写完后，也骂了几声"混蛋"。对黄的处置是否过重，人们说法不一。但陈诚此举有一定震慑作用，确是不可置疑的。宜昌县长武长青，在颁发鸦片烟膏新旧牌照的交替期间，经过请示行政督察专员吴良琛，同意商人们的捐赠达一定数额款项的前提下，可先无照营业。这种捐赠的款项，既有利于缓解县财政的困难，又可使县长本人得到好处。有人把这件事告到陈诚那里，正逢陈诚召开县长会议。陈诚令将武长青解押恩施（当时省会设恩施）。县长们拭目以待，他们知道武长青和陈诚有同学之谊。到了会议结束的一天，陈诚下令："宜昌县长武长青贪污有罪，着即枪毙。"主办法官踌躇良久，鼓足勇气向陈诚直言："武长青的案件还没有审讯，可否等审问清楚了再枪决？"陈诚大怒，吼

道：“什么审讯不审讯，马上枪决，不准迟疑。”据说武长青临刑前，大呼冤枉。曾经同意武长青接受捐款的行政督察专员吴良琛，吓得魂不附体，跑到测字摊上去算命，求问吉凶。

内战主将(1)

抗战胜利后，陈诚主持军政部，开展部队复员与接收工作。1946年5月，国民党政府接受美国军事顾问团的建议，决定撤销军事委员会及其军令部、军政部、陆军总司令部，设立国防部。31日，正式发布命令，陈诚任参谋总长兼海军总司令。这样，陈诚便掌握了全国军事大权，可以直接秉承国民政府主席的命令，统帅陆海空军。

陈诚被任命为参谋总长后，尚未正式宣誓就职，便遵照蒋介石的命令，通过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指挥第五、第六两“绥靖”区的部队约十个整编师30万人，于1946年6月26日，向中原解放区李先念部发动进攻，从而点燃了全面内战的战火。

紧接着，陈诚又调动第一“绥靖”区李默庵部、苏北“绥靖”区李延年部和第五军邱清泉部，向苏中、苏北解放区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他甚至扬言：“两星期解决苏北问题。”七八月间，苏中解放区部队在粟裕、谭震林的指挥下，打了个“七战七捷”，歼灭国民党6.5个旅和5个交警大队，计5万多人，而国民党军只夺得了海安等两座空城。

1947年2月21日，陈诚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可是，只过了一天，山东战场便响起了丧钟。鲁南战场的李仙洲集团于2月23日在莱芜、吐丝口间华东野战军的袋形阵地中，遭到毁灭性打击，第七十三军、四十六两军主力被解放军全歼，第二“绥靖”区副司令李仙洲被俘，胶济路西段及其两侧城镇十多处获得解放。

在当年“双十节”的“国庆献词”中，陈诚仍宣称：“要乘机将整个###主力消灭，尽复失地，使###此次进扰为最后的一次，以便明年今日东北四千五百万同胞皆能欢欣鼓舞，同申庆祝。”此时他受命主持东北战局，然而，东北战局与陈诚的估计正好相反。经过东北解放军50余日的主动进攻，陈诚所部东北国民党军被歼6.9万人，15座城市获得解放，农安至铁岭间、锦州至山海关间的铁路均被破坏。

1948年元旦，伴随着东北解放军冬季攻势隆隆炮声，迎来了被陈诚认为是其一生中极为黯淡的日子。解放军的攻势来得太快、太频繁。秋季攻势刚过，冬季攻势又开始了。为了稳住军心、民心，陈诚在东北大力整肃军纪，惩办了一些贪污人员，取缔了到处游荡的散兵游勇，将一些惹是生非的人员或驱逐，或监禁。东北局面似乎有些转机。接着进行军事行动，对东北解放军进行“扫荡”。

铁岭、沈阳、新民是一个三角地带。陈诚集中了15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向彰武、法库方向推进。在这场战斗中，陈诚与林彪——国共两军的主将，都采用了围歼的战术，结果，东北野战军达到了战役歼敌的预定目标。

号称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新五军军长陈林达发现自己进入险境，立即给坐镇沈阳指挥的陈诚发去急电，请求从秀水河边的公主屯退守到有坚固设防的辽河西岸小镇巨流河。

陈诚对于作为机动兵团使用的新五军，究竟应退至辽河边固守，还是应坚持现有突出位置进攻，举棋不定。他命令新六军廖耀湘部，务必于5日前抵达公主屯，与新五军会师。但此时，解放军的包围正逐步完成，新五军的退路愈来愈窄。1月5日，解放军开始发动冲击。两军在茫茫的雪原上厮杀了三天三夜。在激烈的战斗中，解放军始终处于主动地位。新五军终于抵挡不住解放军凌厉的攻势。它的军部和两个完整师——第43师和第195师，共2万余人被全歼，军长陈林达被俘。而负责为新五军解围的新六军，却在新五军被全歼后，才姗姗赶到。

新五军全军覆没的消息由陈诚报告蒋介石后，蒋介石极为震惊。10日，辽河枪声未息，蒋介石便带了国防部作战次长刘斐、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由南京直飞沈阳。蒋在沈阳亲自主持召开军事会议，追查造成新五军惨败的责任。高级将领们经过一番推诿、争吵之后，陈诚只好无可奈何地表示，自己指挥无方，请求按党纪国法惩办。对于

陈诚自请处分，蒋介石虽然不忍下手，但总不能不有所交待。于是陈诚以十二指肠溃疡出血急待治疗，去职了事。

内战主将(2)

卸却参谋总长职务的陈诚，到上海不久遵蒋之嘱赴台养病，远离了大陆上激烈厮杀的紧张气氛，远离了物价飞涨、通货膨胀的局面，也远离了“杀陈诚以谢国人”的逼人气势。他在人生的低谷中，于台北度过了一段短暂的、平静而又惆怅的岁月。然而也就是因为陈诚在这期间与人民解放军的对抗，他成为第三号战争罪犯。

经营台岛(1)

1948年冬，陈诚在台北静养之时，正是大陆国共两军在辽沈、平津和淮海三地进行战略决战的关键时刻。蒋介石如坐针毡。种种迹象表明，南京政府已在劫难逃。蒋介石不得不把维持国民党政权的最后一线希望寄托于与大陆隔海相望的台湾岛。既然如此，就得派一个信得过的人物去镇守该岛。于是，在政坛沉默半年多的陈诚又得到了重新活跃的机会。12月29日，根据蒋介石的提名，由孙科主持的行政院决定，任命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开始着手经营台湾。

主政台岛后，首先面临的局面，即是社会的混乱，官场的腐败，致使民怨沸腾。如不采取有力措施，加以纠正，国民党在台湾将难以立足。他宣布的施政方针包括：政治上推行地方自治，健全组织，提高行政效率，确立人事制度，施行“土地改革”政策；经济上增加生产，稳定物价，施行“三七五减租”；文化上奠定实施计划教育的基础，建设三民主义的新文化。

陈诚于1949年初就任台湾省主席后，一改昔日在鄂严厉打击贪污腐败行为的严峻作风，对在官场中泛滥的贪污现象，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认为，政府职员的工薪收入过低，与贪污现象盛行有一定的关系。陈诚在主政台湾期间，始终重视提高公教人员的待遇问题。他上任不久，即在省府例会上决定了解决公教人员待遇问题的原则，即：（1）同地同酬，划一中央机关与地方机关待遇；（2）文武一致；（3）差额接近，高级少加，低级多加；（4）奖励专门技术人才；（5）年资加俸，计口配给实物，所配给之实物将扣回其薪俸的70%。他特别对专门技术人员的加薪作了具体规定，使他们能安心工作。

台湾社会的稳定当然包括农村、农民的稳定。按照陈诚与台湾省当局的设计，在大陆始终未能进行的“耕者有其田”活动终于启动。台湾的“土地改革”共分为三个阶段，即“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与“耕者有其田”。在1949年间初步完成的“三七五减租”，首先调整了租佃关

系，规定耕地租额不得超过主要作物全年收获量的37.5‰，不及者不得增加。随后蒋介石在9天内给了陈诚两道亲笔手令，指示推进“土地改革”工作。陈诚一面筹划在城市中开征空地税、土地增值税及办理房屋租借登记等项事宜，一面于春夏间，拟订、颁布了《台湾省开垦荒地放领公地扶植自耕农实施方案》《台湾省放领公地扶植自耕农实施办法》《台湾省各县查定放领公地注意事项》等法令；在各县组建了扶植自耕农促进委员会，以协助省政府民政厅地政局和各县市政府开展放领土地的工作。到1952年底，开始实施征收地主土地，交农民承领的政策。到1960年代前期，台湾初步完成“土地改革”。

陈诚主持的台湾省“土地改革”，基本上是以有利于农民的方式解决了台湾农民的土地问题，封建主义势力基本上被消灭，大量佃农转为自耕农，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同时地主手中获得大量的地价资金，转投工商业，对台湾工商业的发展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起了某种推动作用。这一改革基本上是成功的，陈诚因此在国际上，尤其是在东亚国家与地区中，享有盛名。当然，台湾省“土地改革”对封建势力的打击又是十分温和的，它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地主，尤其是大地主的利益。它是在不触动土地私有制，承认和保护地主剥削所得的基础上实施的，因此，必然存在着一定局限性。

战后台湾的金融形势十分严峻。为了稳定台湾的金融，陈诚认为必须改革币制。他于1949年1月、3月先后两次去大陆见蒋介石、李宗仁，都未获得批准。5月，再赴广州，方获蒋介石认可，准将中央存台的80万两黄金作为币制改革的基金，美钞1000万元作为台省对外贸易的基金。在台岛金融危机渐趋严重的情况下，陈诚决定标本兼治，一方面封闭了兴风作浪的地下钱庄四五百家，严厉禁绝金融投机买卖，使金融风潮得以平息；一方面从根本上治理货币流通制度，断然实行改革，发行新台币，并以无限制的黄金蓄兑政策维持币信。

经营台岛(2)

1953年，台湾当局开始执行“第一期四年经济建设计划”，其主要任务为：以最有效迅捷的途径，从事经济建设，提高农工生产能力，充裕物质供应，满足岛内市场需要及增加出口以求对内经济的稳定，对外改善国际收支。1956年，第一期四年计划的各项指标，基本实现或接近完成，工农业生产都有了大幅度提高。工业平均年均增长率达11.7%，超过了11.1%的原定指标。农业年均增产6.2%，比原计划平均增产4.8%的指标，几乎提高了30%。

第二期四年计划于1957年开始，主要任务是：继续开发资源，增加农业生产，加速发展工矿业，扩展出口贸易，以提高国民所得，增加人民就业，平衡国际收支，从而加强经济作战能力。在陈诚及继任“行政院长”俞鸿钧的共同努力下，基本取得成功。1961年陈诚又主持制定了第三期经济建设计划。第三期的目标，在于改善环境，提高生产能力，增强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扩展对外贸易，减少对美援的依赖程度，逐步建立新的社会经济结构。这期的执行情况，大大好于前两期，各项关键性的指标均达到，不少指标远远超出。实际总投资超过计划指标的19.1%，国民生产毛额增长了44%，平均每年增长9.5%。

陈诚在他的晚年，为台湾的经济发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的关于重视资金的积累、重视技术、讲求效率和速度等经济建设思想，很有可资借鉴之处。

政坛腾挪

1950年3月，陈诚随着蒋介石复职“总统”，出任“行政院长”。1954年2月15日至16日，国民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举行临时全体会议，推选国民党“总统”、“副总统”候选人。16日，蒋介石以国民党“总统”候选人的名义，提名陈诚为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3月22日，在“总统”选举中，蒋介石经两轮投票，以绝对多数票当选。“副总统”的选举，也经过两轮投票。第一轮以得票未超过“法定”代表的半数，未能通过。在24日进行的第二轮投票中陈诚得1417票，当上了“副总统”。“行政院长”由俞鸿钧继任。

陈诚在就任“副总统”三年后，即1957年，被推上了台湾政坛和自己宦海生涯的巅峰。这一年，他经蒋介石提名，被推选为国民党副总裁。下一年春，任职“行政院长”不满四年的俞鸿钧因遭弹劾而下台，蒋介石只好再请陈诚“组阁”。这样，他成为台湾身兼“副总统”、“副总裁”和“行政院长”三要职，位居蒋介石一人之下、千万人之上的“二号人物”。

陈诚在台湾政坛中的稳固地位，得力于国民党的改造运动。由蒋介石一手主持、陈诚积极参加的国民党改造运动，对于退居台岛一隅的国民党当局来说，乃是一次“吐故纳新”，是关键的一着棋。

对于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失败，蒋介石认识到“戡乱失败的最后一步，还是在党的失败，而党的失败的主因，是在三民主义信仰的动摇”。此时，除了儿子蒋经国，他实际上已不真正信任任何人了。他在后来向国民党七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说：“我从下野到复职的这一期间，经过了深长的考虑，最后决定一定要改造本党，认为这是改革政治和改造风气的动力。”

1950年8月31日，中央改造委员会通过了由蒋介石主持制定的《本党现阶段政治主张》，这是国民党改造运动中的纲领性文件。其要旨如下：（1）用决心和信念革###的组织，整肃党的纪律，改变党的作

风，实现三民主义；（2）恢复“中华民国”领土主权完整，团结一切力量，坚持“###抗俄”战争；（3）实行民主主义经济措施，使各行各业有均衡发展之机会；（4）保障人民基本自由，建立“廉洁而有作为”的政治；（5）“反攻”时期严惩“元凶首恶”，实行军民分治，推行“地方自治”；（6）加强“全国”军民同胞的团结。

陈诚积极参与的国民党改造工作，前后共经过了两年时间，至1952年10月9日，即七全大会召开的前夕，在蒋介石亲自主持下，举行了中央改造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第420次会议。会议宣告了中央改造委员会工作的结束。自此，在大陆时期的“###”们全部退出政坛，一大帮新面孔在台湾党政军中崛起。陈诚、蒋经国成为台湾政坛中炙手可热的人物。当然，陈诚也很清醒，蒋介石重用他，是要他帮小蒋一把。

虽然陈诚尽可能提携、帮助蒋经国，但对两蒋的工作作风仍有一些不能认同，甚至出现抵制。蒋介石对陈诚的忠心是不怀疑的，可要是影响到蒋经国的接班，那又当别论。有一年陈诚过生日，邀请胡适、蒋梦麟、梅贻琦、王世杰南下旅行庆祝。香港媒体将此事渲染为现代的“汉惠帝与商山四皓”，让蒋介石开始有了心结。陈诚心知肚明，决心辞去“行政院长”之职。蒋介石见陈诚如此，知道他不再是传位的“障碍”，于是继续利用他。直到1963年底，蒋介石才同意陈诚退下来。

陈诚主政台湾期间，秉承蒋介石意旨，一直叫嚷“###”，并将其作为对台湾军民进行“精神动员”的一条中心口号。1962年初，陈诚参加了由蒋介石为首、5人组成的“反攻行动委员会”，负责作出“###”的各项最高决策。然而，历史注定了“###”的计划只是说说而已。1961年陈诚访问美国，美国国务院将1955年以来中美大使级会谈的记录拿给陈诚看，意图拉拢陈诚。陈诚看后对人说：“中共拒绝美国一切建议，而坚持美国舰队及武装力量退出台湾的做法，不受欺诈，不图近利，是

泱泱大国风度。”大陆朋友几次给他写信后，他托人转告大陆，他会向历史有个交待。

病逝台岛(1)

自1964年9月3日起，陈诚突然连续腹泻，体重降下许多，虽经各种药物治疗及加强营养，终不见效。医生们觉得来势不妙。10月14日，由陈约翰医师陪同巴大维、张先林两位教授共同会诊，发现肝脏肿大并坚硬，其表面有蛋形硬块，诊断为肝硬化合并肝癌症。20日，陈诚赴荣民总医院作放射及肝功能检查，发现右上腹部肝硬块与临床诊断相符。主治医师遵照蒋介石、宋美龄的嘱咐，立即在陈诚官邸设立了设备齐全的临时病房，指定2名医师、3名护士和1名营养专家，悉心护理照料。

蒋介石指示，给陈诚在海外读书的子女寄去飞机票，让他们回来看望父亲。小女儿陈平，整日陪着母亲守候在父亲的身边，大女儿陈幸带着幼子从海外归来。大儿子履安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与夫人曹倩，携带刚满1岁的孩子赶到台北。在纽约读书的二子履庆，四子履洁和在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攻读物理学的三子履碚，都匆匆来到父亲身边。这次团聚，使陈诚在生命结束以前，最后一次见到了所有的儿孙。

陈诚因为得到夫人谭祥的精心护理，精神上又享受到与亲人团聚的安慰和满足，病情一度趋于稳定。有时，他能在花园中散步，逗弄依偎膝下的孙子、外孙。但是，进入1965年以后，陈诚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自3月3日起，陈诚已不能饮食。这天早晨8点左右，他招来长子履安带纸笔至其身边，口授遗言三条。他用浓重的青田口音，低声地、缓慢地说：（1）希望同志们一心一德，在总裁领导下，完成国民革命大业。（2）不要消极，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全国军民，共此患难。（3）党存俱存，务求内部团结，前途大有可为。

这66字的遗言，思路清晰，内容完整。这是他对人们提出的要求，也应当是他一生的总结。然而，与陈诚一贯的思想、言论及当时的台湾气候相比较，人们不难发现，其中竟未出现“###”和“反攻”一类

的词句，只强调一点：精诚团结在蒋总裁的领导之下。他曾向蒋介石进言：对中共不能反潮流；不能为外国动用台湾的兵力；不能信任美国；不能受日本愚弄等。陈诚的这种态度说明他晚年的心境。遗言发表前，有人想要在陈诚的遗言中加上“###、反攻”一类的内容，陈诚夫人不同意。她找到蒋介石，蒋介石同意不修改。

3月4日上午，陈诚病情已相当危急，脉搏每分钟在百次以上，血压降至80。中午，谭祥低声对陈诚说：“‘总统’和夫人马上要来看你。”陈诚听后，竭尽全身的力量，在夫人的帮助下，勉力下床，坚持坐在椅子上等候。在蒋介石、宋美龄来到后，陈诚以微弱的声音，伤感地对蒋介石说：“‘总裁’，我的病恐怕不容易好了……”蒋介石、宋美龄则尽量给陈诚夫妇以安慰。他们在这里一共停留了30分钟。

3月5日陈诚去世，台湾各大新闻媒体进行了充分报道。蒋介石手书挽匾、挽联登在显目位置。挽匾上书：“党国精华”。挽联是：“光复志节已至最后奋斗关头，那堪吊此国殇，果有数耶！革命事业尚在共同完成阶段，竟忍夺我元辅，岂无天乎？”公祭之日，蒋介石亲率文武官员致祭，备极哀荣。陈诚去世后，国民党“副总裁”一职从此取消。

经过四个多月才选定的台北泰山乡墓址，在一块海拔400米的山腰平台上。这里四周是连绵的山峰，山坡上植满了郁郁葱葱的修竹和相思树。殡葬日期定于8月30号。陈诚的墓地与他的家乡青田县，直线距离只有400公里左右，可谓是近在咫尺。可是，茫茫的台湾海峡像一道无形的墙，将陈诚的墓地隔绝在水之一方。家庭生活蒋介石要抓住陈诚，当然要从家庭生活入手。

当年蒋、宋结为伉俪，乃谭延?]为月老。谭生前曾多次带其三女儿谭祥造访蒋宅，谭祥于是认蒋氏夫妇为干爹妈。谭祥既是蒋宋的干女，又是宋的留美同学，品貌端庄，聪慧出众，宋美龄极愿为她的婚姻大事出力。陈诚在1930年出任第十八军军长，久为蒋介石所器重和赏识，尽管陈诚在老家已有发妻，但蒋亲自主持，促成陈谭婚配，使得蒋、陈政治上更加紧密结合起来。

病逝台岛(2)

陈诚与谭祥，原本要在1931年10月10日订婚，后由于江西对红军的战事紧张，于是延到次年初正式结婚。1931年12月，在办完了与发妻吴舜莲的离婚手续后，次年元旦，陈诚身穿戎装，与手捧玫瑰花束的谭祥，在上海沧州饭店举行了隆重的婚礼。蒋介石、宋美龄亲临祝贺。接着，他们双双到杭州西子湖畔，度过了蜜月。

婚后，谭祥作为陈诚的贤内助，持家有方，尊敬婆婆；偶尔当陈诚人际关系上遇到麻烦时，也出面到宋美龄面前予以周旋，使之化险为夷。谭氏随陈诚度过了“剿共”、抗日和内战的常年战争岁月。1948年秋抵台后，陈诚在宦海生涯中节节高升，他们又过了一段较为安定和舒适的日子。但是，一个阴影却逐渐笼罩了他们这个美满幸福的家庭：陈诚的身体江河日下，日益衰弱。

1964年10月下旬，医院为陈诚作了“肝穿刺”，以便为他的肝脏病状作出最后的结论。化验的结果表明，陈诚所患确实是肝癌。这是现代医学技术对陈诚的健康作出的“终审判决”。

常年跟随陈诚作私人医师的沈彦大夫，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将这个结果带到陈诚官邸。谭祥在惊恐之后，理智地要求沈彦，暂时不要把真实的病情告诉陈诚。他们只对陈诚说，他患了一种不太严重的肝硬化症。

为了治疗的方便，在建立了家庭诊疗病房和医师诊疗小组之后，陈诚即由楼上的卧室搬到楼下来住。谭祥除料理家务外，主要的精力都用来陪护丈夫。她陪陈诚谈笑，照顾他的饮食，用妻子的温情，来减轻丈夫的痛苦。晚上，陈诚不休息，她不离开病榻。大多是在陈诚的再三催促下，她才依依不舍地回房休息。每天上午9点，夫人必定准时出现在丈夫的病榻边。大家都熟悉了这种生活的习惯。稍有迟到的谭祥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便会莞尔一笑，说：“我等你很久了。”

当一切的迹象显示出陈诚的生命已经临近终点的时候，陈夫人再也不肯离开他半步。她不肯睡觉，不肯吃，放了一张半躺半坐的椅子，守在丈夫的病榻旁，目不交睫地注视着丈夫，惟恐丈夫突然弃她而去。

陈诚临终前，宋美龄前来探望。她劝谭祥暂时回卧室去休息一会。陈夫人不好不听蒋夫人的话，这才被半拖、半劝地送到楼上。宋美龄并吩咐医生为谭祥注射些镇静药，让她睡一会。谭祥哭泣着哀求道："陈先生要过去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叫我！"

她没有睡多久，就被护士急促的脚步声惊醒。她被搀扶着下楼，来和共同生活了三十四年的丈夫诀别。当陈诚最后停止呼吸的时候，谭祥抚尸痛哭，口中连呼："修辞，你为什么不带我一起走……"她在献给丈夫的挽联上写道："伤心成独活，哪堪白首不同归。"

在陈诚重病期间，他们夫妻间的恩爱与深情，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谭祥是家里的贤妻良母。她主持家务，教育孩子，除去礼仪上规定的活动外，她并不过问丈夫的公务。但也有一次例外。抗战期间，陈诚在恩施担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他下了一道命令：全省文武僚属，一律不准坐轿子。命令公布后，一位厅长患痔疮，又有脚气病，无法走路上班，但又不敢违抗命令，只好痛苦地坚持步行。几天后，厅长的太太不忍心，求见了陈夫人，请求陈诚能准许她的丈夫坐一段时间轿子。谭祥的心被说动了，她为这位厅长说了情。据说这是仅有的一次。陈诚与谭祥共生有二女四子。他们的孩子都出生在抗战胜利以前。其出生的次序为：长女幸，次女平，长子履安，次子履庆，三子履碚，四子履洁。

陈诚用自己固有的道德观来教育子女。他要求自己的孩子勤劳、节俭、守纪律。陈诚的小儿子履洁在上台北女师附小时，常常一个人最先到教室，把所有的课桌抹干净。孩子的耳朵里常响起父亲的话："辛劳的工作一定要争着做，不要推诿，不要偷懒。"

陈诚从来不用小汽车送孩子上学。他对孩子们说："司机是公家雇的，你们上课是私人的事，不能用公家的车。"履碚、履洁上小学时，都是乘公共汽车，赶不上公共汽车就步行。一位记者报道了陈诚教育孩子不应乘坐轿车的故事：1949年1月陈诚担任台湾省政府主席。此时他有两个孩子在台北女子师范附属小学读书，每天都是走路上学。有一次下大雨，孩子跑到学校，弄得满身泥水。顽皮的同学们就逗他说："你看，有些当厅长、当经理的孩子都坐小汽车上学，你爸爸做这么大的官，为什么不给你坐汽车上学呢？赶快回家向你爸爸要汽车坐。"孩子天真得很，回家以后，马上就向爸爸提出这个要求。陈诚听了以后很好笑，就问他的孩子道："你们有脚没有？"孩子答："有两只脚。"又问："脚是干什么的？"孩子答："走路的。"于是陈诚就笑着对他的孩子说："我坐小汽车就因为在替国家办事，是国家给我的一种待遇，你们没有替国家办事，怎能享受这种待遇呢？小的时候学着吃苦耐劳，长大了能替国家做事，是吗？"孩子听了这番话，点了头走了，以后再也不要小汽车坐了。

病逝台岛(3)

后来履洁快小学毕业时，陈诚替他买了一辆旧的自行车。履洁每天放学后，都要拿废布在校园里擦车，把车子擦得干干净净。老师问他为什么不花3元钱送到车店去擦，履洁答：“我爸爸说我们还不会赚钱，应该节省每一文钱，能够自己做的事就自己去做，不要假手于人。”

陈诚在繁忙的公务之中，还十分重视孩子们的作业。他常在孩子们的练习簿中，加一张鼓励他们的条子，有时他没有空做，便把这项工作交给夫人谭祥去做。每逢孩子生病，不能按时到校上课，陈诚夫妇总是以父亲、母亲的名义恭敬地写好请假条，请人送给老师。有时，则是事后亲自到学校向老师说明原因。长子履安去美国读书了，但他却是一名工读生。他的学费完全靠自己工作挣来。有时，他不得不停下学业，做一学期工，挣够了学费再继续读书。三子履碚在工专读书时，有一个闻名全校的习惯，即哪怕是只花了几角钱买邮票寄信，他也会郑重其事地掏出笔记本，将账目记上。他的孩子不以父亲的地位来显示自己。大女儿陈幸在美国读书时，同学们并不知道他的父亲是什么人。1961年陈诚去美国访问时，美国报纸上登出了陈幸的照片，同学们才恍然大悟。次子履庆，眼睛高度近视，本可免服兵役，但他主动要求与别的同学一样参加服役。他说：“如果我不服兵役，人家如果不说我有近视，只说我是‘副总统’的儿子，那就不好了。”

陈诚的六个儿女，看上去都普普通通，他们没有高人一等的想法，应该说与陈诚的教育和影响有很大的关系。

陈履安1937年生于江西庐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电机工程学系毕业后，再进纽约大学深造，获数学博士学位。陈诚在台湾卓著的政绩和谨慎谦和的性格，为陈履安的从政奠立了良好的人脉与名望基础。早年他与蒋孝武、连战、钱复并称为台湾政坛四公子，曾任台湾“经济

部长”、“国防部长”、“监察院长”和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等职。受其父影响，陈履安工作勤恳，为人实在，在台湾政界评价相当高，且坚持“一个中国”立场，这就必然与李登辉产生矛盾，1996年因此而退出国民党，并作为独立候选人参加台湾首届“总统”竞选，2001年恢复党籍。晚年信佛，提出“救中国、救人心”的理念，希望两岸和平统一。他曾计划投资50亿元西进祖国大陆，为此遭到“###”分子的攻击。

参考文献：王继光：《陈诚家世生平考述》，《西域研究》2005年第2期。

吴锡泽：《陈辞修先生年谱简编初稿》，（台湾）《传记文学》第63卷第1期。黄嘉树：《国民党在台湾》，南海出版公司1991年版。

郭骥：《陈诚传记资料》，台湾天一出版社1979年版。

方知今：《黄埔名将——陈诚》，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

方靖：《六见蒋介石》，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执笔：杨 垒）